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7 年 6 月 30 日第 92 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 4〕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的“黑信”

渔歌子整理 四川专（州）县文革小报（部分）简目

生逢乱世

何 蜀 我亲历的“唐尧勋事件”——兼谈造反派的另一面

附录 何蜀录入 彭家治讲话

浩劫墓碑

王锐提供 林洛录入 1967 年成都“五六”事件死者名单

王锐提供 渔歌子摘录 1967 年万县市“六三”惨案死者名单

叶大明整理 永川两派武斗死亡人员名单

书海泛舟

渔歌子摘录 周伦佐书中写到的西昌文革（《“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小资料

渔歌子整理 四川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成立简况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故纸堆】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的“黑信”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录入者说明：本篇原题为《看！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张守愚的变天账》。原载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红联）主办的《省红联战报》第十

一期，1968年5月26日出版。

在由“省红联省委宣传部革命造反兵团”所加按语中称，张守愚在文革时是四川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文化革命七人小组成员兼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省文革副组长，是“李家王朝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得力干将”，还批判他有如下一些“反动言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打不倒，要拥护”，“对李井泉要一分为二”，“我要到中南海和毛主席辩论”，“不管谁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也要反对”，“群众是一条狗”等等。这些言论估计是当时大字报中揭发的。从张守愚女儿张戎所著《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张朴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可知，张守愚在一次批斗会上公开说了“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也要反对”的话，被毒打后捆送公安局，当时公安局拒收，但后来张守愚又因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停止文革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因为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中共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开展的，因此在当时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敢于如此公开反对文革的人极为罕见。张守愚因此遭到残酷批斗摧残，一度被逼疯，后于1975年含恨病逝。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平反。这几封信都写于1967年4月，被批判者称为“四月黑信”。其实这都是家书。这些信是怎样落到批判者手中的（抄家还是从邮局截获），不得而知。

当时四川省级机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分为两派，省红联是八二六派，此时在成都都是占上风的主流派；另一派是红成派的省造司（四川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

信件内容是批判者摘录的，省略号是小报刊登时原有的。黑体字是批判者加的批语。转录时均照原样未作删节。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守愚给他女儿的信

我现在过的是半死不活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成了众矢之的，先是领导者把我不当人，后来是“群众”把我当敌人。我知道，领导者把我不当人，是因为我敢于提意见，敢于坚持斗争；但“群众”为什么那样仇视我呢？大约是因为我在他们心目中是领导者。

……对有些人我看穿了他们的两面派手段，我因怕上当而不得不无所作为，打熬着，等待着天明。但我现在听见鸡叫，都是在半夜，谁知道有没有天亮的时候。不过，我并不绝望，我没有对党对人民失掉信心。

等我脑子稍好一点，我将写出近一年我遭受的折磨、打击与迫害。我不能不有所准备。

按：“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灾难；一个阶级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新的压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是张守愚之流的末日，把他们一伙拉下马，打翻在地，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他们会就此罢休吗？当然不会！张守愚不是在“打熬着，等待着天明”吗？但这不过是白日梦呓。天，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张守愚这几只嗡嗡嘶叫的苍蝇，唧唧悲鸣的爬虫，妄想变天，只能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守愚给他妹妹的信

……我是要革命的，但我看不见敌人，暂时也没有同志，我那些旧日的同志们，有的只剩下一付脑壳，他们的灵魂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的人可能原来就不是好东西。

我现在正在变，思想在变，形象也在变，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发疯、受伤、残废，拖上种什么病，特别是近来经常出点血（因挨斗被踩压，肺出过血），现在则经常擤鼻涕带血丝。会不会搞上癌症呢？很难说，由不得自己，只能听命于命运主宰者。但我是希望活着的，有谁愿意死呢？

但是我发现三姐也有些异样，似乎也有点病，这大概是时疫没办法的。

写到这里，我想你的信有的地方也不正确，你似乎也是有病的，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发生的呢？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张守愚给他老婆夏德鸿的信

……对吐唾沫者，报之以唾沫，是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如毛主席说的纯粹的人，人的心肠是肉做的，是受大脑支配的，不是铁板的一块，也不是胶片、石头。

……有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是什么“私”？如果这也是应破之例，那不就证明敌人诬蔑共产主义要共产公妻、破坏家庭是正确的？……现在“左”得可爱的人多得很（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造反派简直恨之入骨），在破私立公的理解上，就存在着有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

我认为这个问题和我所见到的成都地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有某种联系，但是这个问题出现在我眼前的事，似乎一切都是旧东西的再现，或者是掺杂着“沉渣的泛起”，使人见了就恶心的形势，是對抗党中央的人制造的，我不相信这是在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决定。

按：这两封信里，左一个“时疫”，右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再一个

“沉渣的泛起”，这些胡风式的反革命语言，都是张守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从阴暗的角落里冲刷了出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而张守愚却胆颤心惊，万分难过，则发出了临死前的悲鸣。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张守愚之流“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是天大的好事，这正证明我们做得对了，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限，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张守愚给夏德鸿的信

读书的成绩不好，固然要由我自己负责，但外界的干扰也厉害。面前是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而且已经运动到我家里来了，自己又是这个运动冲击的一个重点，家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怎么能够安静地坐下来，不问世事呢？当然我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到群众中去。但我去的效果都不好，我以后还是要去的，但是我必须注意使我自己不落入某些人埋伏好了的圈套……

……但如果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提到党和人民，那其实是办不到的。手里拿着红旗，而想的和做的却是另一回事的人我看是有的，我不想做这种人……现在也不见得比那些装腔作势的写了几张大字报，口头上喊几句拥护毛主席的人落后，……而不怕那些手里拿着灵魂窃听器的人议论和嘲笑。

按：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张守愚则恶毒的咒骂为“装腔作势”，别人一提到“党和人民”，张守愚就暴露出强烈的憎恨，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张守愚则诬之为“灵魂窃听器”。在这些恶言毒语里，张守愚这个国民党余孽的狰狞面目，暴露得一干二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守愚给他女儿的信

爸爸的问题，总要有个下场。我将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的写出自己的遭遇——我所受到的打击、迫害和折磨，同时也检查自己。我还是不准备写“大字报”，……那天上街买了一支毛笔，笔铺以为我是去买大字笔的，一进门就告诉我，大字笔已经没有了。这使我记起，上次跟你伯伯一道去买鸭子，鸭店的店员告诉我们，写大字报把纸都用完了，现在连包装纸都买不到了。他的话，可能失之夸张，但也是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只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记下来，是将来下台的切实准备，也许又一次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过还没有写出来，那时候怎样决定，要看那时候的情况和心情。

按：张守愚咬牙切齿地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连他所要的纸笔“没有了”，他要纸笔，“不准备写‘大字报’”，而是要把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斗争，即他所谓的“打击、迫害和折磨”，一条条地“记下来”，以等时机，反攻倒算，变天复辟！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是何等危险的情景啊！

【故纸堆】

四川专（州）县文革小报（部分）简目

渔歌子 整理

整理者说明：这里搜集了文革前期的四川省除成都、重庆二市外的群众组织小报部分篇目，温江专区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成都市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报刊史料专辑》（内刊）第18、19、20、21辑合刊第五部分“解放后成都报纸要目”的附录《四川省图书馆藏文革报刊要目》。整理中还得到王锐、李晓航、庞国义、谢声显诸先生的大力帮助，谨一并致谢。这个简目仍缺失很多，望知情者提供修订补充意见。

四川省各地区，文革爆发时除成都、重庆、自贡三个省辖市及新建的渡口市外，共有12个专区和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现按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先后为序排列（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专区均改称地区）。因行政区划不断有变化，各专区、自治州所辖市、县情况，有的是从网上查得，不一定准确，也望知情者提出订正。

自贡市

红色恐怖报（“特刊”） 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1966年12月14日创刊。4开4版或6版

1967年1月出版第3期

公社之声 毛泽东主义公社 主办

1967年3月4日创刊。4开4版

1967年3月6日出版第2期后，因“镇反”被停刊。1967年4月14日复刊出第3期。共出版24期。1967年7月1日出“七一专刊”后停刊，新办《自

贡红卫兵》。

自贡红卫兵 自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

(1967年10月18日第20期起改称“四川自贡红代会机关报”)

1967年7月10日创刊。4开或对开，个别期号为16开(杂志版)，一般4版。1968年8月出版第57期。

盐都炮声 自贡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 主办

(1967年10月31日第21期开始，改为自贡市工代会主办)

1967年6月7日创刊。4开或对开，个别期号为16开(杂志版)，一般4版，有时6版或8版。

1968年10月出第60期后停刊，新办《自贡工人造反报》。

自贡工人造反报 自贡市工代会 主办

1968年10月创刊。4开或对开 1969年1月出刊第5期后停刊。

革命大批判 自贡市工代会 主办

对开4版。1968年4月创刊(在宜宾印刷，后因局势变化，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不敢正式发行，将之全部销毁。仅出创刊号一期，存世极少)。

6722炮声 自贡工代会 6722部队

对开 1969年1月出刊

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会刊 公社之声、盐都炮声、毛泽东主义新闻兵 主办

4开4版。1967年6月15日出刊

庆祝毛主席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字一周年会刊

自贡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自贡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自贡市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自贡市红色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七一”战斗团、“三八”战斗团 主办

4开2版。1967年8月20日出刊

盐都炮声 自贡红卫兵(联合增刊)

自贡三司 自贡红代会 联合主办

4开6版。1967年7月17日出刊

盐都炮声 自贡红卫兵(联合版)

4开4版。1967年8月8日出刊

血染红旗 盐都炮声(联合版) 泸州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自贡联络站、自贡《盐都炮声》编辑部 联合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7日出刊

井冈山(自贡版) 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特刊号 4开4版。 1967年8月8日出刊
山城通讯（自贡版） 重庆工农兵文艺公社南征北战纵队编
4开1版。 1967年9月15日出刊第2期
江城红卫兵（自贡版） 红卫兵泸州部队 主办
4开4版。 1967年6月15日出刊第2期
一打三反战报 自贡市革命委员会“一打三反”办公室编
4开4版。 1971年4月10日出刊第5期

乐山专区

乐山专区文革爆发时辖乐山、犍为、井研、夹江、沐川、峨眉、眉山、彭山、青神、洪雅、丹棱、仁寿12县。

火线战报 乐山红色造反者火线指挥部宣传部编
4开4版。 1967年6月9日出刊第21期。
工人战报 四川乐山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联合总部 主办
4开4版。 1967年11月4日出刊第4期
聋人烽火 四川乐山专区红色聋人革命造反团总部 主办
4开4版。 1967年9月30日出刊第3期
青江怒涛 夹江《青江怒涛》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 1967年7月9日出刊第5期，1967年9月5日出刊第10期
眉山一〇·一二事件专刊 打李总站眉山联络站 主办
4开6版。 1967年12月2日出刊
新疆烽火（夹江版） 新疆红二司克拉玛依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办
1967年8月31日出刊。4开4版。

渡口市

红电讯 《火线报》革命职工
狂飙 渡口贸易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总部
1967年11月7日创刊。
红三线 渡口红三线
渡口工人 渡口市工代会

宜宾专区

宜宾专区文革爆发时辖宜宾市、泸州市2市和宜宾县、泸县、江安、合江、纳溪、叙永、古蔺、筠连、屏山、富顺、隆昌、南溪、珙县、兴文、长宁、高县16县。

红色造反报 四川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5月30日出刊第3期

革命造反报 宜宾革命造反联合战斗团 主办

（后改为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主办。1969年前后又增加宜宾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为主办单位。）

4开4版，不定期。1966年底创刊，1967年1月26日出版第6期。“二月镇反”时停刊。5月4日出版复刊2号（主办单位“革命造反宜宾方面军”，“五一三”武斗后转到自贡印刷，7月在成都新华印刷厂印刷两期（每期8版），8月回到宜宾日报印刷厂印刷。1969年2月出复刊第93期。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泸州红旗 泸州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

4开或对开。1968年9月18日出版第83期。

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血染红旗 红卫兵泸州部队、《江城红卫兵》《九一二战报》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或4开2版。1967年7月12日出刊第2期，7月13日出刊第3期。

1967年12月10日出刊第37期

血染红旗 泸州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赴蓉告状团

1967年7月25日创刊。不定期，4开4版。

工农红旗 红旗职工联合会、泸州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会

4开4版。1967年12月26日出刊第4期

江城红卫兵 红卫兵泸州部队

九一二战报 红卫兵泸州部队泸州医专九一二革命战斗团

4开4版。1967年12月21日出刊第17期

反复辟战报 泸州市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反复辟兵团

红闯将报 红卫兵泸州部队红闯将革命战斗团

1967年6月18日创刊（创刊号4开2版）。

红闯将 泸州市红闯将革命战斗团

1967年12月7日出复刊二期（本期二版），主办单位更名为泸州红联站红卫兵54军7804部队《红闯将》革命战斗团。

红色战讯 泸州市红联站红工红火炬、红印战士革命战斗团

宜宾专刊 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

红旗 四川宜宾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中红旗 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2日出刊第25期

红旗报 宜宾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29日出刊第14期。

红旗 泸州红旗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有时4开2版甚至4开1版。

1967年9月7日出刊第6期（4开1版）。

突破口 四川宜宾地专红旗总部《突破口》编辑部主办

4开4版。1968年6月出刊第4期

井冈山 红旗宜宾方面军七九九井冈山、宜宾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三中红旗 联合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2日出刊第2期

铁拳头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泸州分团 主办

4开4版。1968年2月出刊第21期。

泸州红旗（富顺）**红旗**（联合版）

对开4版。1968年5月30日出刊。

红旗 四川富顺二中红旗八·一〇战团 主办

（后改为四川富顺三代会《红旗》编辑部主办）

4开或对开，一般4版。1967年6月9日创刊。1968年10月出刊第47、48期合刊（对开）。

富顺红旗 四川富顺红旗革命造反指挥部 主编

4开4版。1967年8月30日创刊。

井冈山（富顺）红旗工读校井冈山兵团 主办

4开4版。1967年6月23日创刊。

起宏图 高县起宏图红旗革命造反军 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10日出刊第2期，1967年9月14日出刊第5期

反到底 南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10月1日出刊第7期

二·一八炮声 红卫兵隆昌部队政治部 主编

4开4版。1967年9月16日出刊第12期

隆昌工人 四川隆昌县工代会 主办

4开4版。1969年3月6日创刊。1969年4月出刊第3期。

隆昌风雷 隆昌县三代会 主办

4开4版。1968年6月30日出刊第2期。1969年3月15日出刊第12期。

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长缨 隆昌师范无产阶级革命派《长缨》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12月5日出刊第2期，12月13日出刊第3期。

山城反到底（川南版） 《山城反到底》编辑部

4开4版。1967年10月8日出刊第3期

涪陵专区

涪陵专区文革爆发时辖涪陵、南川、垫江、丰都、石柱、武隆、彭水、酉阳、秀山、黔江10县。

忠实兵战报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7年7月1日创刊，1968年9月10日第41期终刊，另出未编号特刊5期。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涪陵战报 涪陵 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联司 红色专政 联合主办

（1967年12月11日出刊的第2期在其后又加上“前线指挥部”称谓。）

4开或对开，一般4版。1967年11月19日创刊。1968年8月15日出刊第12期。

政法公社炮声 四川涪陵政法公社革命联合委员会 主办

4开4版。创刊期不详。1967年11月30日出版第三期。

涪陵问题 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西师八·三一纵队、重大井冈山公社以及涪陵红代会、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15个组织合编

对开4版。1967年12月19日出刊。

反逆流 涪陵红代会、政法公社革联会、新华电讯革联会联合主办

4开4版。无期号 1967年12月10日出刊。

忠实兵战报（成都版） 涪陵红卫兵代表大会 主办

4开4版。1967年12月14日出刊第2期。

万县专区

万县专区文革爆发时辖万县市和万县、梁平、开县、忠县、云阳、城口、奉节、巫山、巫溪9县。

造反有理 中共万县地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遵义红旗 万县市人委

前沿炮声 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军

江城战报 万县市赤旗战团、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造反军合编

4开4版。1967年10月8日出刊第45期，以后改为万县市三代会合编，1969年7月出刊第174期。

四川万县市“六·三”大血案专刊 万县市革命造反联络站 主办

4开6版。1967年6月10日出刊

挺进 万县（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内江专区

内江专区在文革爆发时辖内江市、资中、资阳、简阳、威远、荣县、乐至、安岳等县。

1966~1968年间另有在威远县红村（四川石油会战总部驻地）先后出版的《会战通讯》、《红涛》、《石油怒火》等，系反映整个四川石油会战“战区”情况的小报，四川石油管理局本部在成都，故将这三种小报另列入成都地区小报名单。

红卫兵报 内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内高总部 主办

（从第14期起改为内江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主办）

4开4版。创刊出第6期后因“镇反”被停刊。1967年6月1日复刊出第7期，1967年10月8日出刊第14期。

沱江怒吼 内江地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主办

（后主办单位加上四川内江挺进革命造反兵团）

4开4版，有时6版。1967年8月5日创刊。1968年12月出刊第53期。

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沱江潮 内江工联、红司、农司 联合主办

4开4版。1967年9月16日出刊第12期

斗争内江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海泉大会专刊 大会筹备处 主编

对开4版。1967年4月9日出刊。

打倒李井泉在内江的一小撮同伙（揭发批判材料） 内江专市县干部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政工组 编

4开4版。1967年11月20日出刊第3期。

风雷 内江地区工人司令部四川农机厂纵队、内江红卫兵司令部四川农机厂井岗山 主办

4开4版。1967年10月1日出刊第6期（4开2版）。

红旗 荣中红旗公社 主编

4开4版。1967年7月24日出刊第8期。

绵阳专区

绵阳专区在文革爆发时辖绵阳、梓潼、罗江、德阳、绵竹、安县、广元、旺苍、剑阁、江油、北川、平武、青川、昭化、遂宁、三台、蓬溪、盐亭、潼南、射洪、中江等县。

涪江怒涛 绵阳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成铁“二七”战斗团绵阳分团、绵阳井冈山工人造反兵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绵阳分团 联合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26日出刊第10期。

红囚徒之声 《红囚徒》绵阳专区联络站 主办

对开4版。1968年4月出刊第3期

打倒工人革命军专刊 （绵阳）井冈山工人造反兵团宣传部

4·1、5·12死难烈士会刊 四川绵阳工代会 5·12死难烈士治丧委员会

对开4版。1968年5月25日出刊

绵阳五·三一惨案专刊 四川绵阳202革命造反总队、202七一革命造反队合编

对开4版。1968年7月20日出刊

五卅战报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江油分站

长城炮声 四川江油三〇二革命造反司令部、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驻江油联络站、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赴江油学习队 联合主办

4开4版。1967年9月2日出刊第2期。

万山红 平武革命造反部队总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10日出刊第3期。

四二八战报 四川遂宁县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

继光战报 红卫兵中江部队

新继光报 继光中学新继光红卫兵团政宣组

横空出世 红卫兵中江东方红公社《横空出世》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1968年3月5日出刊红2期。
庆祝射洪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刊 四川射洪县三代会 主编
4开8版。1968年9月30日出刊。

达县专区

达县专区在文革爆发时辖达县、宣汉、开江、平昌、巴中、南江、通江、万源、大竹、渠县、邻水11县。

巴山烽火 达县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络站
捍红战报 达县（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反到底 大竹反到底司令部
4开4版。不定期。1967年7月创刊，1968年10月停刊。

甘孜藏族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在文革爆发时辖康定、泸定、丹巴、雅江、道孚、巴塘、理塘、炉霍、新龙、乡城、甘孜、德格、白玉、石渠、色达、稻城、得荣17县。

长征 甘孜长征宣传组

1967年5月18日出版第4期。

消息动态 甘孜1211

1967年7月27日创刊。

八·二六炮声（康定版） 红卫兵成都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三司）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赴康炮轰团、井冈山野战军赴康铁血团主办

1967年6月28日出刊。4开4版。

炮声隆 甘孜（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风展红旗 成工造雅安分团、甘孜州《红十条》派《风展红旗》编辑部
4开4版。1968年5月出刊第3期。

阿坝藏族自治州

阿坝藏族自治州在文革爆发时辖马尔康、小金、金川、若尔盖、红原、壤塘、

汶川、理县、茂县、松潘、黑水、南坪 12 县和茂汶羌族自治县。

雪山风雷 阿坝州红色造反总指挥部 马尔康地区红卫兵联络站

4 开 4 版。1967 年 7 月 6 日出刊第 5 期，1968 年 8 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温江专区

温江专区在文革爆发时辖温江、郫县、彭县、大邑、崇庆、灌县、广汉、金堂、邛崃、双流、蒲江、新津、什邡、新都等 14 县。

平反专刊 温江无产阶级革命派《平反专刊》编辑部

1967 年 11 月 20 日出版。对开 8 版。

红缨枪 毛泽东思想温江地区红文艺革命造反总部

1967 年 8 月 6 日出第 17 期。4 开 4 版。

同心干 双流同心干工农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双流分团宣传组

4 开 4 版或 6 版。

（1967 年 8 月 25 日第 9 期起，改为同心干工农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工程分团宣传组 合办）

红色战报 金堂红代会赵中红色造反兵团 主编

4 开 4 版。1967 年 11 月 2 日出刊第 2 期。

金堂风雷 金堂县革命职工代表大会政宣组

1968 年 2 月 29 日出第 15 期。4 开版。

指点江山 郫县毛泽东思想红卫总队

1967 年 7 月 20 日出第 4 期，4 开 4 版。

彭县烽火 红卫兵彭县部队

1967 年 5 月 25 日创刊。不定期，4 开 4 版。10 月 17 日出第 10 期。

湔江评论 彭县地区工代会政宣组

1968 年 6 月出第 19 期。4 开 4 版。1968 年 8 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斗私批修 灌县井冈山一二·四造反兵团宣传部

1967 年 10 月 29 日出第 9 期。4 开 4 版。

青城怒火 灌县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 年 7 月 7 日出第 2 期。4 开 4 版。

八五造反专刊 灌县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革命造反第3司令部、灌县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967年8月15日出版。

八·二六惊雷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灌县分团、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灌县分团

4开4版。1967年7月4日出第2期，1967年9月14日出第7期。

都江怒涛 灌县革命造反兵团、灌县岷江红卫兵革命造反团、红卫兵灌县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红囚徒》灌县联络站

1967年7月1日创刊。不定期，4开4版或4开6版。主编。7月20日出第2期。

都江洪流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灌县分站《都江洪流》编辑组

1967年12月16日创刊。4开4版。

一〇·六炮声 新津一〇·六战斗团政治部

1967年7月1日出第2期。不定期，4开2版。9月13日出第5期。

文攻武卫 崇庆地区捍卫红十条《文攻武卫》编辑部

1967年7月26日出第3期。对开4版。

浪遏飞舟 崇庆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小组

1967年9月2日创刊。4开4版。

今胜昔 邛崃县文化馆三五·一战斗队

1967年11月出第2期。4开2版。

井冈山风暴 新都机械制造公司井冈山公社宣传部 主办

(1968年1月31日第9期起，改为成都军工井冈山 新都井冈山公社主办)

1967年5月28日创刊。不定期。4开4版。1968年2月20日出第10期。

星火 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造反兵团

1967年5月13日创刊。不定期，4开4版。5月28日出第3期。

雅安专区

雅安专区在文革爆发时辖雅安、荣经、汉源、天全、宝兴、芦山、石棉、名山等县。

雨城红卫兵 红卫兵成都部队雅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新)总部

风展红旗 成工造雅安分团、甘牧州《红十条》《风展红旗》编辑部

通讯战报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126石棉通讯部队

1967年8月12日出第7期。4开2版。

红卫兵 红卫兵成都部队雅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雨城快报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雅安分站
棉山炮声 四川石棉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革命造反团、红卫兵棉山部队、工农联盟司令部 联合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30日出刊第3期。
羌江怒涛 雅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羌江怒涛》编辑部 主办
对开4版。1968年6月出第25期，1968年7月出第26期。
羌江 雅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 主办
4开4版。1968年3月出第18期。
批判电影专刊 雅安电影院编
4开4版。1967年8月15日创刊。
羌江风云 打李总站东方红工农战斗兵团、雅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合编
16开4版。1968年1月5日出刊，无期号。

西昌专区

西昌专区文革爆发时辖西昌、会理、会东、宁南、冕宁、盐边、德昌、米易8县和盐源彝族自治县、木里藏族自治县。

工农兵战报 西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10月14日出第18期。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凉山彝族自治州

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文革爆发时辖昭觉、普格、喜德、美姑、金阳、布拖、越西、甘洛、马边、峨边、雷波11县。

学习资料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凉山联合指挥部、凉山东方红公社 翻印
4开4版。1967年11月22日出刊第6期。
打倒刘少奇专辑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凉山联合指挥部 凉山东方红公社
4开4版。1967年11月23日创刊。

南充专区

南充专区在文革爆发时辖南充市和南充县、西充、岳池、武胜、广安、蓬安、营山、南部、仪陇、苍溪、阆中 11 县。

井冈山 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编辑部主办

（1968 年 1 月起改为南充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反逆流指挥部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兵团主办）。4 开或对开，一般 4 版。1968 年 7 月 26 日出第 70 期。1968 年 8 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南充风雷 南充红卫兵反逆流指挥部南充师院革命到底纵队主办

4 开或对开，一般 4 版。1968 年 7 月出第 8 期。

川北烽火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南充分部川北烽火编辑部主办

4 开 4 版。1967 年 8 月 18 日创刊。1967 年 9 月出第 2 期。

中流击水 四川《红十条》派南充《中流击水》编辑部 主办

4 开 4 版。 1968 年 3 月创刊。

反逆流 南充（出版单位不详）

1968 年 8 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革命造反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字 445 部队革命造反者联合司令部（海军第四航空学校，阆中）

造反有理 广安工农司令部 广安革命造反司令部 联合主办

1968 年 6 月与《南充风雷》等联合出版《三报合刊》。

井冈山（成都版） 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报编辑部

1967 年 7 月 31 日（成都版）创刊。4 开 4 版。8 月 10 日出第 2 期。

南充风雷 八·二六之声 造反有理（三报合刊）

对开 4 版。1968 年 6 月出刊。

江津专区

江津专区（后改永川地区）在文革爆发时辖江津、永川、铜梁、江北、璧山、合川、大足、荣昌 8 县。

永川红旗 永川红旗革命造反派委员会政治部 主办

（后改为永川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联合主办）

4 开 4 版。1967 年 8 月 20 日创刊。1967 年 12 月 22 日出第 13 期。1968 年 8 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九七战报 四川江津九七革命造反派政治部

4开4版。1967年10月13日出第10期

迎红日 四川江津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政治部
4开4版。1967年9月24日出第5期（永川版）。1968年8月参加联合出版《四川红十条派二十报合刊》。

几江怒涛 江津农校红总 主编
4开4版。1967年11月15日创刊。

东彪卫士 四川璧山中学《东彪卫士》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10月21日创刊。1968年6月第11期为联合出版的《九报合刊》（对开4版）。

荣昌战报 荣昌革命造反派《荣昌战报》编辑部 主办
4开4版。1967年8月23日出刊第3期。后停刊。复刊时改为红十条派荣昌两代一筹政宣部 主编。1968年6月出复刊第4期（总17期）。

永荣风暴 永荣矿务局（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6月第25期为联合出版的《九报合刊》（对开4版）。

三江怒涛 合川（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6月第12期为联合出版的《九报合刊》（对开4版）。

六·一七炮声 大足（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6月第15期为联合出版的《九报合刊》（对开4版）。

铜梁红联 四川铜梁（出版单位不详）
1968年6月参加联合出版《九报合刊》（对开4版）。

【生逢乱世】

我亲历的“唐尧勋事件”

——兼谈造反派的另一面

何 蜀

引言

在王锐编撰的《自贡市文革大事记》书稿中，附录有《自贡文革时期有影响的15件大事》，其中第十二件是“‘反迫害兵团’与唐尧勋被批斗致死事件”，该节中介绍：

自贡市反迫害兵团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底，其成员主要是1949年以来，

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和处分，受当局迫害的干部。唐尧勋一度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

唐尧勋，四川绵阳人。1930年代入党的延安老干部。1949年10月随部队南下入川，受命接管川康盐务管理局五通桥分局，1952年初调自贡任川南盐务管理局副局长。唐妻丁兰，也是1930年代随唐一起，经地下党运作从上海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延安中央医院唯一的妇产科医生（原就职上海教会医院）。江青生李讷时，中央指定丁兰接生。为此她还参加了毛泽东为接生医务人员亲设的家宴。毛泽东曾当面赞曰：“丁兰，丁兰，花木兰！”后来，丁兰受上级安排，弃医从政。随唐尧勋调自贡后，任川南盐务局人事科长。

1952年7月在该局一次党组会上，唐尧勋被以“男女问题”、“反标”等为由立案，后开除党籍，曾关押4年多。1957年2月被有关部门宣布“免于起诉，无罪释放”，恢复自由。唐尧勋出事后，丁兰被迫与之离婚，后任市卫生局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丁兰亦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开除党籍，下放至医院做清洁工。

文革初期，唐尧勋被以“托派”等罪名在市人委（政府）机关被批斗。反迫害兵团成立，唐尧勋一度任主要负责人。

1967年“三月镇反”开始后，反迫害兵团亦遭打压。危急下，唐尧勋设法逃离自贡赴京上访。4月初，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已获中央平反并即将赴川任职的刘结挺，正从四川赴京上访的干部中了解各地、市、州情况。5月初，唐尧勋得以在北京西苑旅社两次受刘结挺接见。5月8日的接见中，刘结挺对唐尧勋说：“你的材料我还没仔细看，你的情况已有人向我谈过。我们再过几天就回成都了，你跟我一道回成都，我提前解决你的问题。”此时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已出，刘结挺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筹小组副组长，位居四川新领导班子“三号人物”。5月9日刘结挺再次接见，对唐说：“你跟我一道回成都，我首先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只有回成都才能解决。”唐担心回川风险，刘结挺说：“你如果回自贡市，我把你交给李宗白，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找李宗白要人。”

其时李宗白亦在北京参加四川问题会议，唐尧勋因之又去见李。李宗白表态说：“你长期受迫害，都是党内走资派一手搞的。他们迫害你，主要是你反对他们，你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又说：“老唐，我们回去一起搞，你回去就把人委（指市政府）搞起来。”还说：“你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负责给你解决，我们是一定能够解决的。”6月，唐尧勋从北京返成都，27日在空字028部队礼堂再次见到刘结挺。刘结挺指示唐尧勋，主要搞“干部调查”。7月中旬，由省革筹办川南组正式发出同意恢复自贡反迫害兵团的通知。

唐尧勋于7月22日返自贡。23日，李宗白派人接见唐，并传达李宗白指示

说：“（反迫害兵团）只恢复上面，不发展下属组织。（隶属关系上）不属‘机司’（机关司令部），也不属‘无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市工代会前身）；可以多和我们联系，有事可直接找我。任务搞干部调查，重点是调查受迫害的干部，为今后提供结合干部名单。材料可拿到武装部去打印。”并同时提供了三处可作反迫害兵团办公的地址，让其选择（刘结挺两次接见，以及李宗白与之谈话内容，均见之于1970年8月市革委印发的“批判李宗白材料”）。

反迫害兵团正式恢复后，设立了接待室，专门接待全市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处分的干部，并编印“工作汇报”，报送省市相关部门。据一份“工作汇报”记载，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接待了60人，收到材料40份。其中，被打成“右派”的占46.5%。

反迫害兵团的成员，也主要是当年受打击处分等不公正待遇，要求申诉“翻案”的干部。比较知名的有：唐尧勋已离婚的妻子丁兰，被打成“右派”的市人民法院原院长李振华，市检察院原检察长赵清洁，“右派”作家陈学名（曾4次受李宗白接见）等。当局后来的一份材料称，“在‘反迫害’的成员中，大搞翻案活动的就占百分之七十三”。据披露，反迫害兵团高层内部有一个计划方案，商定“先解放赵清洁，进入市革委，再解放李振华，唐尧勋”。另有反迫害兵团成员更表示，“誓死将唐尧勋扶进市革筹或比市革筹更高的三结合权力机构”。

1967年下半年以来，刘结挺等省革筹领导层对干部“翻案”问题持审慎态度。李宗白为首的市革委，对唐尧勋及反迫害兵团亦态度大变。唐尧勋在自贡处境不佳，遂赴成都寻求群众组织支持为之“翻案”，还一度试图利用成都八二六与红成两大组织的对立，增加“自身价值”。其时唐尧勋通过自贡石油部门的人联系上了八二六派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唐曾对他们讲，红成的人几次在大街上想将他抢去，说要为之“翻案”，但被他拒绝。以此促使“兵团”一方引起重视，加紧为之“翻案”……（详见《昨天》第58期“王锐自贡文革研究专辑”，2015年9月30日）

这段文字中有关唐尧勋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帮助为其翻案的情况，是我在编稿时告诉王锐后加上的。因为当年我就在石油系统分团中直接参加了为唐尧勋翻案的具体工作。

背景：内战中的内战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无业者（原为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的临时工，已于1967年4月被解雇），完全出于狂热的“革命热情”，一心要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命”中“投入火热的斗争”，而心甘情愿地在造反派组织中义务做文字工作。我原在筑路处时的造反派组织，1967年3月“镇反”运动中被压垮，4月“反击二月逆流”开始后，没有被解雇的那部分（主要是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所在地威远红村附近邓沟水库工地的荣县临时工）中的造反派恢复重建了原组织“一二·四兵团”，并在7月里加入已经得到《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肯定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成为兵团下属的“石油一二·四分团”。10月18日，“一二·四”又与四川石油系统的成都总机修厂、天回镇石油器材库、四川石油设计院等单位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基层组织及川中矿区钻前工程团（驻遂宁）的造反组织等合并（当时好听的说法叫“归口联合”），组成了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分团的勤务组成员有：总机修厂的邱发兴、李富荣（与那位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同名）、罗尚举，天回镇石油器材库的陈天泉（医生），石油设计院的老汪（名失记，外号汪胖），筑路处的陈宇光（荣县临时工），川中钻前工程团的曾新祥（江安临时工）等。大概除陈宇光和曾新祥是临时工外，其他都是正式职工。勤务组成员中陈宇光最年轻（与我同龄，当年十九岁）。

我是在1967年7月初离开重庆返回筑路处重新参加造反组织活动的，以后就奔波于荣县（东兴场红七村，筑路处机关驻地）、威远（新场红村，石油会战总部机关驻地）和成都之间，1968年的多数时间都在成都，为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做“笔杆子”工作。

人们都知道，全国许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在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中矛盾激化，陆续分裂成两派打起了内战。但许多人不知道，分裂之后的造反派，同一派内部还会打内战。这种“内战中的内战”，在四川石油系统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典型。

当时，从1965年开始的“四川石油大会战”（号称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已经因为文革大动乱而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但石油会战总部机关（即四川石油管理局机关的主体部分加上石油工业部和其他油田参加或支援四川会战的干部）仍然在威远县山沟里的“基地”红村。1967年6月底，以成都军区通信兵部主任赵永清为首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红村，7月3日召开大会并发布公告，宣布坚决支持在3月“镇反”中被镇压但在5月间已经得到恢复的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以著名的“32111英雄钻井队”副队长彭家治为一号勤务员，实际主事决策的是石油会战总部的机关干部和四川石油学院的大学生），军管会明确表示要与川油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于是，四川石油系统（或称石油会战“战区”）以红村的川油司为代表的“镇反”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派，和“镇反”中一度得势的一派——包括“镇反”中取代川油司在红村成立的四川石油工人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川

油工筹会或筹委会，被造反派骂作“臭味烩”，已经被赶出红村迁到川南泸州气矿）、川北南充的石油地质调查处等单位的同一派（派别观点上分别属于泸州“红联站”和南充“临联”）之间，就展开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冲突及大规模武斗，川油司还在军管会支持下派出武装人员参加了围剿泸州红联站的“武装支泸”行动并有伤亡，在红村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军管会派出代表参加并作了“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讲话。

至于兵团石油系统分团，本来与川油司都是在“镇反”中遭到镇压的难兄难弟，是同一派，但却另有历史恩怨及现实矛盾：

在1967年1月夺权高潮中控制了石油会战总部、以机关干部和正式职工为主的川油司，对红村附近水库工地以临时工为主的“一二·四”兵团向来看不上眼，双方素有嫌隙。当“镇反”之风刚刚刮起的时候，2月26日深夜，川油司就先发制人地抄砸了“一二·四”，川油司在筑路处的下属组织则同时行动抄砸了在红七村的“联合司令部”（“一二·四”为首组建的筑路处一个造反派联络机构），并分别宣布两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列举了“十大罪状”，勒令解散，还向公安机关递送了整理好的“罪行材料”。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了3月4日，威远、荣县等地同时由内江军分区戒严，由公安机关实行大抓捕，川油司与“一二·四”的许多头头都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拘捕，组织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摧垮。

4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之后，被捕的造反派获释出狱，大家都得到平反并恢复重建了组织，本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了，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川油司自视为四川石油战区的“老大”，根本不承认“一二·四”参加的“兵团石油系统分团”，认为这些临时工投靠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分明是要与川油司分庭抗礼；而成都的石油总机修厂等单位的兵团基层组织又看不起在威远山沟里称王称霸的川油司，认为自己这个上了中央文件的响当当的组织才是四川的“老大”。这样，在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与川油司之间便一直争斗不休。

再加上驻红村的石油管理局军管会，为了通过已经控制石油会战总部机关的川油司来稳定石油战区局势，便“一面倒”地将川油司作为石油战区的“正统”，甚至不承认兵团石油系统分团（要求其各基层组织加入川油司），以后并默许川油司把石油系统分团的人员用武力赶出红村和红七村等地。所以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头头陈天泉在红村召开的一次分团“筑路部队”（即原“一二·四兵团”）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公开大骂军管会主任“赵永清就是石油战区的赵永夫”……

这就形成了同一派内部也势不两立派战不止的局面。其最高峰的表现，在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典之后——

6月2日，“新生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除去赴重庆参加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典的李大章、梁兴初、张西挺等之外）集体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原锦江礼堂）接见来自全川各地参加庆典的革命群众代表，石油系统参加接见大会的名额，被军管会全部给了川油司。被排除在外的兵团石油系统分团闻讯后怒不可遏，但接见大会已经开始，在成都的石油系统分团人员及石油校八二六的学生被紧急集合了数百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前往东方红礼堂，要求参加接见大会，先是在礼堂前边紧闭的大铁栅门前与警卫部队对峙，举着《毛主席语录》反复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张、梁、刘张”，并有代表前去提出交涉。交涉无果后，有石油校八二六的红卫兵率先爬上铁栅门翻进去，突破警卫士兵的拦阻，强行打开大门，人们蜂拥而入，被闻讯赶来的更多警卫部队以人墙阻隔在礼堂门廊台阶上，差点把一场弹冠相庆的接见大会搅黄。冲击大会的人们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歌、“抬头望见北斗星……”，直到新任省革委常委、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五十军副军长、成都警备区司令员孙洪道和同样新任省革委常委的兵团总部头头侯振东出来，才安静下来。侯振东满面春风地代表省革委宣布：“明天，省革委领导单独接见你们！”冲击大会的人们（笔者就在其中）这才含泪欢呼着撤离。

次日，以张国华、刘结挺为首的二十余位省革委领导人在红照壁礼堂专门接见了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和东方红八二六石油分团的人员，分别发表了热情的讲话。特别有意思的是，新任省革委副主任的川油司“司令”彭家治也不得不作了呼吁川油司与石油系统分团大联合的讲话（详见附录），并且为他在石油战区大联合上“工作没作好”表示道歉——但不知他事后在川油司内部是否挨骂，只知道兵团石油系统分团报道这次接见大会首长讲话（笔者是主要的记录整理者）的对开小报《石油炮声》第5期（1968年6月14日出版），寄到川油司控制地区（如威远红村、荣县红七村）的，一旦被川油司人员发现，尽管上面有他们拥护的张国华、刘结挺以及他们的“司令”彭家治的讲话，仍然被一律收缴撕毁……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为了摆脱在石油战区的弱势地位，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开始了为唐尧勋翻案的工作。

翻案风

当时到处都刮着翻案风，这是文革以来形势造成的必然结果：过去的许多领导政治运动整人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而且成了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斗重点，那么，按照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最高指示”，被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

打下去的干部，自然就成了受迫害的“好干部”。

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吴臣，在“四清”运动中被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打成“坏分子”，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虽然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明文规定不准“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但在1967年初仍然由支左、支农部队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吴臣平反（此后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专门报道和《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假四清 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

在四川，曾被李井泉处理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宜宾地区干部，于1967年4月得到中共中央平反，并在平反通知中称他们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刘、张夫妇马上被提拔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得到这些现实例子的鼓舞，许多在过去政治运动中被打击的干部（或已故干部的家属）都纷纷起来申诉，要求翻案平反，如在四川大饥荒时最先解散公社大食堂、被农民呼为“邓青天”的原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打成“四川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县专区被迫害的万源县委“草鞋书记”熊曙东，万县专区被打成“右派”的专员赵唯（原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因向中央控告李井泉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四川大饥荒而遭到打击报复的重庆市委“萧、李、廖反党集团”，摘掉“右派”帽子后仍然不让返回城市继续留在长寿湖农场劳改的一批重庆干部……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的陈联诗，早在中共执政初期的1952年即被以莫须有罪名强迫“退党”，后含冤病故，其女儿、女婿及外孙辈全家出动，组成了为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翻案的“华蓥战团”，做调查，编小报，印传单，出大字报专栏……而一些造反派群众组织则积极帮助这些干部翻案，其中既有主持正义、打抱不平的想法，也有通过帮助这些干部翻案平反而获取更多政治资本的意图。记得当时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就曾考虑过为四川石油管理局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总工程师翻案的问题，我曾看到过头头们传阅的一份材料，但后来可能对“右派”能否翻案感到吃不准，没有正式进行。

唐尧勋一案，是由自贡一个叫宋向东（显然是文革名字，真名不详）的人介绍给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的。宋向东是隆昌气矿造反联络总部（简称造联总）的头头，该组织原是川油司成员，后来退出川油司，加入了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宋向东大约二十多岁，瘦矮个，戴眼镜，经常是长发胡须不理，一副风尘仆仆的职业革命家模样。他在自贡时就参加了为唐尧勋翻案的活动，但因唐尧勋的问题不是政治路线问题，所以自贡的主要造反派组织都不感兴趣，不愿参与。这时宋向东就竭力鼓动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的头头们接手翻这个案。

我最早是听成都石油校八二六的红卫兵小顾讲起这件事的，小顾常在石油系统分团出入（冲击东方红礼堂时他就是率先翻进铁栅门的学生之一），他思想敏锐，口才很好，有“小诸葛”之称，分团的头头都喜欢找他分析形势，有时他对形势的预测还会得到后来形势发展的证实。有关红成与八二六派在争抢为唐尧勋翻案的情况，我就是听小顾讲的（其实他可能也是听唐尧勋或宋向东讲的）。他津津乐道地说，有好几次，唐尧勋在成都街头被红成派的人找到，想要把他挟持走，说他们要为其翻案，但都被唐机智地挣脱了……这种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事自然也引起石油系统分团团头们的重视。于是就把由宋向东带到成都的唐尧勋，奇货可居地保护起来，安排他跟我们一起住在石油管理局小关庙招待所。那一带基本上是八二六派的地盘。

我就在这时被安排撰写石油系统分团为唐尧勋翻案的报告。说来可怜也可笑，当时根本没有经费去为翻案做调查——我这个“笔杆子”都是没有工资的义工（有时还靠造反组织给一点募捐来的生活费或在接待站“吃支左饭”），也说不上进行什么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仅凭唐尧勋和宋向东提供的一点原在自贡就已经写成的申诉材料，再由我来进行重新加工整理，按照当时的“主旋律”调子，尽量写成能够为当政者所重视、所认可的材料。

从唐尧勋的原始材料中可知，他在中共执政后受到过两次“迫害”，不过都与“路线斗争”无关，并无“可歌可泣”之处：前一次的罪名是“强奸保姆”，被撤职处分；后一次是“反标”（即“反动标语”）问题——那“反标”，据说是他发现报案后，被公安局鉴定出来说是他自己写的，不但没有立功反而使他进监狱关了一阵。但奇怪的是后来又“免于起诉，无罪释放”，既然“无罪”，那为什么要关他？这是不是有意迫害？……这样的历史，与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因与上司政见不合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相比，显然是很难做什么文章的。但我只能在这样的材料基础上做好翻案文章。

我当时到底是怎么写的，已经毫无印象。只记得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个八二六派的女中学生向我问起具体情况后，十分不屑地说了一句：“这样的人，你们还给他翻案？”我只好按当时的“主旋律”调子回答：“看大方向嘛！”其实细究起来，唐尧勋在“大方向”上也没有什么反对刘少奇或李井泉的情节，只能说，当年处理他这样一个“延安老革命”的当权者，现在都成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此而已。

近距离印象

在这期间，我就与唐尧勋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我们都住在小关庙招待所楼上，那是一处四合院形、一楼一底、有回廊的老式建筑。有时我要找他了解一些原始资料上没有写清楚的具体情况或一些相关历史背景。他是个矮个子老头，微胖，圆脸，秃顶，有点稀疏的小胡须，不修边幅（当然他的现实条件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修边幅）。闲聊中，他说起在延安时，跟陈伯达、聂元梓都很熟（好像是窑洞挨着的邻居之类），还说到这二人中的哪一位当时缺穿的，他还送了一件衣服。在延安的名人很多，但他只提到（或者是我印象中只记得提到）陈伯达和聂元梓，因为这两位文革中已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但我对他是否讲过他妻子丁兰在延安为江青接生（生的小孩就是李讷）并得到毛泽东宴请答谢的事，已经没有印象了。或许是他妻子与他离婚后，他不好再提起；或许是他讲过，我当时没留意。

有一次，他说要到西南局还是什么机关去找一个老朋友，叫我跟着他，在他身后注意周围动静，如果发现有红成的人想要挟持他，我就及时呼救和报信。我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心中还有些紧张，怕我这个文弱书生到时候不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反应。

天并不太热，他还是在头上扣了一顶破草帽，快步走在前边，我紧随其后，警惕地四下张望着，生怕突然会有人窜出来将他挟持走。但是一路平安，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多年以后，我才恍然想到，这可能是唐尧勋故弄玄虚，以提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身价，促使我们更卖力为他翻案。

途中经过一处街边门面的大饼铺，他停下来去买了一块大饼，拿在手里，回头问我：“你吃不吃？”我忙说不吃不吃。他就转身边走边大口啃起大饼来，显得胃口很好的样子。那天到了他找人的地方，一处大机关的办公楼，里面乱糟糟的，已经没有人正常办公，一些房间空着，有人的房间大概都是些群众组织占用的，问来问去没有问到他想找的人，就只好返回了。

还有一次，是分团的几个头头约请了几个老干部来帮忙分析四川形势。我也去旁听了。除了唐尧勋外，还有另外三四个成都的老干部，都是十分落魄的样子，有的穿件圆领汗衫，有的穿着背心短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穿短裤的老头，短裤前面的裤扣没有扣上，当他把一条腿提起抱在胸前踩在椅子边上时，裤扣处绷开了，显出了里边白晰的肚皮，显然里面没穿内裤。我心中暗想，如果他们一旦得到“解放”或者翻案成功，当上了被结合进“新生红色政权”的“革命干部”，换上一身新军装，马上就会变一副模样……

那天我十分希望能从几位老干部那里听到对形势的高论，可是大失所望，他们讲的，还不如红卫兵小顾的分析精彩。没有一点收获。看得出来，他们对全川的文革形势了解并不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问题。

呈送材料

我的翻案报告写好后，复写了几份（不知是当时分团没有打字油印的条件，还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而没有安排打印），交上去后，也不知分团的头头们是否作过审读研究。反正有一天陈宇光就叫上我，说一起去省革委送翻案报告。

那时候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邓兴国和冯玉德当上了省革委副主任，另一头头侯振东当上了省革委常委。侯振东是国营大厂132厂的技术干部，我们比较熟悉的头头，曾到石油系统分团来作过报告，标准的普通话，口才极好。那天去省革委就是坐的侯振东的小车，陈宇光说那是挂了省革委牌照的，可以直接进省革委大院。果然，省革委大院门前的卫兵看到小车的牌照就挥手放行了。我现在回忆此事时才感到有些不解：为什么侯振东不直接帮忙把报告交上去，而要让我们坐他的小车去送呢？

那是我第一次进省革委大院。进去下车后，陈宇光十分熟悉地带我进大楼上楼（好像是在二楼或三楼，没有电梯），找到一处办公室，交上了报告。陈宇光说是张西挺的办公室，但是张西挺没在里面，好像是她的秘书接下的。

我们出来时，在大楼下面碰到了张西挺，个子不高，短发，干部服（没穿时髦的军装），就像一般电影或连环画上共产党女干部的那种典型模样。她正在门廊前要上一辆吉普车，被一个不知怎么进了大院的老太太缠住了，听口音，老太太是专县来的，边哭边恳求张西挺帮她儿子申冤。张西挺板着面孔，很不耐烦地甩开老太太的手，钻进了吉普车。一个军人拦住老太太，质问她是怎么进来的。老太太就一屁股坐在门廊前的台阶上哭诉她儿子的冤情。我们本来还想听听，但那军人驱赶围过来的人，说这老太太经常来无理取闹，神经不正常，别理她。我们只好走了。但我心里很是为那老太太不平，也很为张西挺的态度不满。后来我想到张西挺那天在喊冤访民面前的冷漠样子，就会想起鲁迅的那句“一阔脸就变”。

翻案报告送上去后我就忙其他事去了。有时，我会想象唐尧勋翻案成功以后的情景：穿一身新的军装，手里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喜气洋洋地出现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但是怎么也难和眼前这个唐尧勋的落魄样子联系起来。

头破血流

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美妙。

忽然有一天，陈宇光回到小关庙来，把我们一些人找到一起，神秘地传达，说刘结挺最近接见了兵团总部和基层支队长以上头头，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不

要再为唐尧勋翻案。

这可不得了！刘结挺是省革委的第四号人物——当时的排序是张（国华）、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同时刘结挺还是成都军区副政委（人们习惯于以军队职务称呼他“刘副政委”，就像当年称呼李井泉为“李政委”一样）。在1967年底，成都的红成和重庆的八一五在梁兴初和五十四军暗中支持下，掀起“打倒刘、张”浪潮，成都的兵团、八二六和重庆的反到底派坚决保刘、张，甚至喊出了“刘张坐牢我坐牢，刘张杀头我杀头”的口号（红成、八一五则针锋相对喊出“刘张坐牢我守门，刘张杀头我提刀”）。直到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发出“三一五指示”，严厉斥责红成、八一五派“打刘、张”是“为李廖翻案”（康生语），“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才把那股“打刘、张”风潮强压下去（但一年多以后中央又决定让刘、张下台，当然那就不是“为李廖翻案”或“刘邓复辟”，而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了）。

作为坚决保刘、张的兵团组织，“刘副政委指示”谁能不坚决执行？于是，就出现了让我刻骨铭心永难忘却的一幕。

陈宇光作了简单的安排后，马上就在招待所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召开对唐尧勋的小型批斗会。我亲眼看到了一个人怎样从“座上宾”到“阶下囚”的瞬间突变。

唐尧勋被几个小伙子从他住的那个房间里“揪”了过来，他进屋后还在莫名其妙地问：“怎么回事？”有人向他传达了“刘副政委指示”，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要他交代问题。面对形势如此的突变，唐尧勋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还争辩了两句，这时，令我十分意外、十分震惊的事发生了——

站在我身边的荣县青年小余，一个很帅气、很单纯的小伙子，是分团一个很能干很勤勉的工作人员，他平时对唐尧勋是很恭敬的，这时突然跨步上前，大喝一声：“你还狡辩！”扬起手里提着的皮带（显然是先已捏在手上有所准备），猛然向唐尧勋劈头盖脸抽打下去——而且是用的皮带的铜扣那一头……只听叭的一声，唐尧勋顿时就头破血流，一道鲜血从他右边额头上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我目瞪口呆。

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过后很久，只要想到这一幕，仍然感到震惊。

唐尧勋没有再说话，甚至（我印象中）也没叫一声。不知他是被打懵了，还是被这突然变故吓傻了、气昏了……

有人把小余拉开了，也有人把唐尧勋带走去包扎伤口了。原计划的小范围批斗会没有开成。不过，开那批斗会的目的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已经与唐尧勋划清了界限，而这头破血流的一幕，不是已经达到同样效果了吗？

文革中的“敌我界限”，往往都要用鲜血来划分。

事后，陈宇光叫我去邮电局给自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宗白发了电报，大意

是：你们要抓的唐尧勋已被我分团抓到，请速派人来带走。

我不知道唐尧勋是什么时候被自贡来人带走的。但我可以想到，他不是穿着新军装“衣锦荣归”，而是头上缠着纱布绷带，被押解着回到自贡的。

抓人的同时都要抄家，唐尧勋在成都无家可抄，就抄他住的那个房间里的床位。参与“抄家”的有人事后笑着对我说：还抄到你为唐尧勋翻案写的材料呢。

我当然只有苦笑。

发生这一突然变故时宋向东不在场。我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成都的。

“三老会”

以后我曾向一些人（特别是自贡的人）打听唐尧勋的下落，但都没人知道。直到看到王锐的《自贡市文革大事记》才知道了唐尧勋后来的遭遇：

四川“批清”运动开始后，唐尧勋被定为“三老会”骨干分子，反迫害兵团问题亦被重点清查。1970年秋，唐尧勋、李振华、赵清洁等被弄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交代问题，地点在自贡卫校。全封闭，“学员”无进出及通信自由，每天检查兼揭发，大小会批斗。1971年2月10日，本来身体不适的唐尧勋，被强行弄到会上接受批斗。经历一天批斗后突然昏迷，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时年59岁。据目击者称，批斗时，唐尧勋已严重不支，呈站立不稳之态，那些人竟用桌子前后将其抵住以防跌倒，又继续批斗。

唐尧勋去世不久，已接替李宗白担任市武装部第一政委、市革委会主任的丛笑难，在市里一次“宽严大会”上说：“三老会骨干分子唐尧勋自杀了。”将唐定性为“自杀”。

“批清”运动是在1970年至1971年间在全国开展的针对造反派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简称，在四川，则特别加上了一个独具地方特色而且成为主要内容的“清查‘三老会’”。所谓“三老会”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莫须有的组织，指的是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遭打压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故称“三老”，但并无什么“会”），在文革中起来闹翻案，要求平反，这样的翻案，当时除了极少数如刘、张等人外，大多被斥为“右倾翻案”，要坚决打击——因为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领导的，都是毛泽东的政绩，翻案，就危及到“毛泽东时代”的形象（或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68年那个对四川文革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三一五指示”中，当四川的支左部队领导人汇报到社会上三老会、七星党等反动组织活动时，周恩来和江青就严厉指示说：“反

动得很。……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在四川省革筹组政工组和成都军区政治部按照张国华的记录整理印发的正式传达文件中，这段话是周恩来与江青一起说的。）刘结挺要求兵团不要再为唐尧勋翻案时，“三老会”问题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心病，因为闹翻案的那些老干部许多都把自己看作与刘、张同命运的人，因而大都站在保刘、张的成都兵团、八二六和重庆反到底派一边，并得到这派组织的支持，成都就有一个“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专门为四川地下党受害干部翻案（许多原地下党干部在文革前十七年陆续被打成叛徒、特务、土匪、托派、右派、右倾……），四川大学的招待所里就住了不少从各地来成都上访要求翻案的受害干部。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的小报《机关反到底》第3期还以两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李廖死党全盘否定四川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打击迫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调查报告》，这期小报出版于1968年3月16日，当时谁都不知道，在此前一天中央领导人已经发出了“三一五指示”，其中江青讲话中对川东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表示了否定，周恩来和江青还对“三老会”作了“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的严厉指示。在“三一五指示”正式传达下来之后（中央学习班四川班3月19日传达，四川省革筹政工组与成都军区政治部正式传达的文件3月20日印发），“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被迫停止了活动，川大八二六也不得不将招待所里的那些上访干部“礼送出境”。

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副政委谢家祥（时任四川省批清领导小组组长）主持的四川“批清”运动中，因刘、张已经倒台，“三老会”问题就被挂上刘、张进行批判追查，那些闹翻案的老干部就成了重点打击对象。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批清”运动才被迫刹车，此后梁兴初、谢家祥又被中央认定为“旗帜鲜明地上了林彪贼船”而倒台，四川又搞了一阵“纠正批清错误”，给一些挨整的人平反，但老干部中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要到文革结束之后，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才能得到解决。

唐尧勋和许多早逝的老干部不幸，没有熬到那个时候。

造反派的另一面

唐尧勋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角色，唐尧勋事件也只是那十年浩劫遍地冤狱中一个并不突出的小事件。但我所亲历的这一事件，却让我真切地看到了文革造反派在“革命造反”之外的另一面，帮助我得到了一些原本“身在此山中”而很难有的认识。

许多年来，在对文革的历史叙述中，造反派常常是一个被扭曲的历史形象，

不是被鬼化（或曰妖魔化），就是被美化。鬼化造反派的，说它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反革命，“帮派骨干”，“三种人”……美化造反派的，说它是抗暴英雄，维权斗士，民主先驱……

在官民对立、贫富悬殊、维权与维稳的矛盾日益加剧的今天，那种鬼化造反派的舆论已经越来越失去可信度。既然一个“伟光正”的执政党的高级干部中都大量出现形形色色、除之不尽的刑事罪犯，怎么可以要求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纯洁无私白璧无瑕呢？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对于不了解文革造反运动历史真相的人来说，更有迷惑性的，是对造反派的美化，有的人甚至会按照今天的想象，认为造反派就是当年的抗暴英雄、维权斗士、民主先驱。

毫无疑问，当年的造反派，确实有抗暴、维权、争民主的一面，但是，应当看到他们还有另一面，看到他们真实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局限性。

造反派向迫害自己的当权派造反，向施暴的当权者抗暴，有值得肯定的正义性。但是他们也会毫不手软地为了同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目的，为了展示或表演自己的“立场坚定斗志强”而向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对象施暴——想一想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惨死，彭德怀元帅在北京航空学院批斗会上遭到韩爱晶等“红卫兵小将”的毒打……至于像唐尧勋头破血流那样的小事在各地就更是不可胜数了。

造反派为自己维权，但是也会毫不犹豫地剥夺别人的正当权利，以铁的手腕为主子的政治需要维稳——想一想首都三司按中央文革的意旨取缔“全红总”，上海工总司砸柴油机厂“联司”，首都红代会的一些组织抄砸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天安门“四五”运动及各地的民众抗议事件时，有的原造反派头头竟然背逆民心站到镇压群众的独裁当局一边，认为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人群就是应该镇压（有人至今还坚持这样的观点）。

造反派为自己争民主，但是并没有现代民主意识，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只知道毛泽东宣扬的那一套“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的专政理论，对自己认定的“反动派”或异见者，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于是，对自己认定的“毒草”就会坚决铲除，“不准放毒”，撕对方的大字报大标语，砸对方的广播车广播站，甚至揪对方的人员强迫“请罪”、“消毒”……这种相互剥夺民主权利的做法就导致愈演愈烈的武斗，直至刀兵相见，把对方当成“阶级敌人”、“国民党”往死里打，自己甚至可以为之赴汤蹈火不惜牺牲……

造反派毕竟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个历史

性群体，是“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在毛泽东的号令和恩准下得以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文革前十七年间宣传灌输的那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坚决批判刘少奇及各地的“走资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而只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等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去解放……

总之，对造反派既不要鬼化，也不要美化。

我们需要的只有一个：真相。

2016 年 12 月 21 日初稿于重庆风江阁

2017 年 6 月 1 日修改

附录

彭家治讲话

何蜀 录入

录入者说明：这个讲话原载《石油炮声》报第 5 期（1968 年 6 月 14 日出版）

1968 年 6 月 3 日，刚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由主任张国华率副主任刘结挺、天宝、邓兴国、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杨志诚、江海云、但坤蓉和常委孙洪道、王际康、李林枝、侯振东、张锦福、李健修、王阴均、袁正蓉、张成女、俄什木嘎等领导人在成都红照壁礼堂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和东方红八二六石油分团成员 800 余人，大会由省革委会常委、成都市革委会主任、成都警备区司令员孙洪道主持，张国华、刘结挺、邓兴国、彭家治、江海云、但坤蓉、侯振东等分别发表了讲话。当时石油系统分团没有录音条件，头头安排我与石油校八二六的女生小韩作记录，会后我将两人的记录综合整理誊清后交分团主办的《石油炮声》报第 5 期（对开 4 版）刊登，并参加了该期小报的校对（具体负责小报编辑的是王公杰、王群，成都哪个单位的不详）。彭家治的这个讲话在第三版，具体讲到了当时四川石油会战战区文革的一些情况和同一派群众组织内部的内战问题。

讲话中提到的石油系统分团一些人，原讲话中和我的记录整理稿中都有姓名，可能是在排印时按分团头头的要求隐去了名只保留了姓。现为便于理解，略加了注释。

最高指示：“革命委员会好！”“四川很有希望！”

兵团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首先让我们祝愿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战友们，人类历史以来，没有这样的运动，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搞这个运动。两年多了，在六八年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省革委诞生了。全国是大好形势，我们四川也是大好。我们兵团的同志们，也和全川的革命造反派一道立下了功劳。今天光是石油系统分团的，关起门是一家人。在战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咱们兵团的同志出了很大的力，把石油战区党内走资派张文彬¹、陈李中²、秦文采³、黄凯⁴揪出来，咱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现在我们战区还没联合起来，我们工作没有作好，我向同志们道歉！（口号）

战区的联合从去年九月份就开始谈起，谈到现在，还没有联合起来，时间很长了（下边问：去年十月十五号达成的联合协议是谁破坏的？）我们工作没有作到家。这里边有你们的老邱⁵、老刘⁶为联合跑了很多，我们没作好工作，我们司令部很多同志工作没作好，有些问题，没有高姿态（口号：向川油司广大革命战友学习！向川油司广大革命战友致敬！）要继续作工作，现在省革委成立了，战区的大联合、三结合要很快解决，在学习班⁷里面陈××⁸、颜××⁹也提出来过，回来怎么办？没联合起来怎么出学习班？我们研究了一个方案，现在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学习¹⁰，回来再作些工作，就联合起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好几个，我们造反派要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区大联合问题摆在面前，也是大家关心的事。昨天有些同志来了，有些没有来。这里边检查几句不够。谈一谈战区大联合怎么搞。大家呼口号反对分裂，确实不反对分裂就联合不起来。文化革命开始，兵团就最先起来，到战区点火，串联，像雄鹰纵队¹¹，器材库的，老邱他们，李××¹²他们，二月黑风过后又帮助我们恢复发展，我们战区 25 个处级单位组成了川油司，发展到 700 多个组织，这也和兵团的同志分不开，兵团的

¹ 张文彬：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

² 陈李中：石油工业部基建司司长，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

³ 秦文采：四川石油会战政治部主任。

⁴ 黄凯：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

⁵ 老邱：邱发兴，成都石油总机修厂职工，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勤务组成员。

⁶ 老刘：名失记，成都石油总机修厂职工，兵团总机修厂组织负责人之一。

⁷ 学习班：指在北京举办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

⁸ 陈××：陈宇光，石油筑路处临时工，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勤务组成员。

⁹ 颜××，颜乾江，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工作人员。

¹⁰ 当时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还没有正式结束，只有部分参加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庆典的代表回来了。

¹¹ 雄鹰纵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成都石油总机修厂的基层组织。

¹² 李××：李富荣，成都石油总机修厂职工，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勤务组成员。

同志是出了大力的。你们串联嘛！点火嘛！现在更应该团结。

另外，我要提点意见，不对可以批判，炮轰火烧都可以，打倒也可以。这个有啥说啥。战区大联合、三结合为什么搞不起来，你们勤务组哪些是勤务员，都不知道，一问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来坐下来谈。《红十条》下来后，李××、罗师傅¹还到了泸州地区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红村“12·4”隔得近，成都的隔得远（众：没有12·4，我们归口了！）有的同志说名字已经改了，我谈的是过去的名称，可能不对，我晚上回去打个电话，和他们说一说，你们名字改了。许多同志没到过红村，情况不了解，把问题澄清，但有些问题说不清。你宋××²，隆昌气矿成立了革委会，你还到处跑，不回去，工代会给你留了位子的嘛！要归口大联合，你们石油系统分团同川油司勤务组坐下来谈，就解决了。联合了的单位就回去，成立了革委会的就搞本单位斗批改。红村地区的回红村，有些不安全的问题，我找勤务组解决。一天打来打去都是工人，有的说打死几个好早点揭开阶级斗盖子，非要敲掉几个才揭得开吗？现在是两条路线斗争，到成都来的你打，到红村去他打。现在专县斗争这么激烈，我们在前方流血，你们在后面搞我们。要支前嘛！联合起来，就把阶级敌人揪出来了。战区老筹³还没有垮，我们应该搞老筹，不要筹委会没倒就搞得你死我活。我们石油部门，毛主席有三次最新指示，搞点油搞点气，不要忘了阶级苦。毛主席最新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在座好多人，十七八岁，要听毛主席的话。川油司勤务组个别人有什么问题就内部提出来。打死两个三个，都是阶级兄弟，哪个是走资派呀？没有一个是。我们互相打内战，打死了怎么交待？坐下来谈，坐不下来。过去的问题有些我处理错误，有些事不果断，出了错。

对军管会，军管会是支持你们的嘛，说老实话，是支持你们的，我们许多战士还有意见。

大联合、三结合，你们搞一套班子，我搞一套班子，人力、精力浪费了。结合对象，你搞一个，我搞一个，一个都对不起来，问题就大了。不要搞两套班子。张文彬和杨艾⁴搞了变天账，要翻过去，在坐的一个都跑不脱。我们要提高阶级觉悟。

有人说我是镇压工人的刽子手，你们看我也是个工人嘛！石油部门的走资派，是薄一波一条线下来的，彭真、阎秀峰、李井泉都到红村去了，不把这些走资派

¹ 罗师傅：罗尚举，成都石油总机修厂职工，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勤务组成员。

² 宋××：宋向东，隆昌气矿造联总负责人。

³ 老筹：指1967年3月“镇反”中取缔“反动组织”川油司之后在红村建立的川油筹委会，其负责人王存友是32111钻井队工人，与彭家治一样是“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自1967年7月3日驻红村的石油管理局军管会发布公告明确站在川油司一边后，川油筹委会已无法在红村立足，被迫撤到川南矿区（泸州气矿），与泸州红联站等组织一起结成对抗省革筹的反对派，并在省革筹支持的“武装支泸”大规模武斗中与前来“剿匪”的川油司等组织展开势不两立的血战。

⁴ 杨艾：张文彬夫人，石油工业部财务司副司长，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成员。

揪出来行吗？我们走资派不搞，内部搞这么凶。江青同志讲：“革命不到底还要打成‘反革命’”。我很想跟同志们见面，老见不到面。今天讲了，可能是代表派性，我先就说了。川中的，厚坝的，找川中分部、厚坝分部，红村的我找筑路分部、红村纵队解决，不能这么搞。这几个单位是不是老李、老罗处理一下，这里边怎么发生的情况不清楚。老干下去不行。往往一谈联合，两句话就干起来了，这次派个得力的谈。战区办个几百人的学习班。今天也啰嗦，同志们有些口号主要是针对有派性，不能有半点含糊。

【浩劫墓碑】

1967 年成都“五六”事件死者名单

王锐 提供 林洛 录入

《昨天》编者按：原载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兵》报、川医《九·一五战报》编辑部合编《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专刊》，1967 年 5 月 27 日出版，第一版。系《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的“光荣牺牲的革命战友统计表”。据该调查公告中总结：光荣牺牲共五十四人。其中枪伤致死四十一人，火器爆破（弹片）伤致死四人，钝器伤致死九人。统计表列出五十二人，表后注中另外提到二人。

“五四”“五六”大血案，指的是 1967 年 5 月 4 日、6 日分别发生在四川棉纺织一厂（简称川棉一厂）和成都一三二厂（制造飞机的国防工厂，对外称国营峨嵋机械厂）的大规模武斗。自当年 4 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后，一度被镇压的成都造反派重新抬头，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展开激烈争斗，成都这两个厂的产业军力量较强，与造反派的冲突最为激烈，特别是在 5 月 6 日造反派冲击一三二厂时遭到保守派以“护厂”为由开枪阻拦，伤亡惨重，引起全国震动。在次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中特地加上了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原决定只有九条）：“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但随着各地大规模武斗愈演愈烈，对此事件的调查处理也不了了之。

赵宗纯，女，成都十八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6 岁。

唐万生，男，单位为青苏公社，死亡诊断为头颈部枪伤，38岁。

蒋应庭，男，成都水力发电学校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火器爆破伤，19岁。

程代弟，男，成都大学学生，红成，成大八·三一成员，死亡诊断为腹部枪伤，22岁。

李信言，男，西昌，东坪青年农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2岁。

冉超凯，男，成都十六中学生，东方红公社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0岁。

余全操，男，市政工程处六队工人，兵团外西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6岁。

潘美德，男，成都五中学生，红成，成电东方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8岁。

陈庆松，男，饮食公司半工半读训练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4岁。

吴安富，男，四川大学学生，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0岁。

候显亮，男，四川师范学院学生，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亡诊断为头部火器爆破伤，21岁。

李海滨，女，成都无线电机校，东方红11·26战团中学教工，死亡诊断为头部火器爆破伤，35岁。

秦劲松，男，成都无线电机校，红成，工院十一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9岁。

胡兵，男，成都二十四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6岁。

倪修全，男，成都二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7岁。

谭平富，男，劳动人民新村小学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3岁。

谢德明，男，眉山中学学生，东方红造反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8岁。

钟桂元，男，一三二厂工人，一一·一九派成员，死亡诊断为腹部枪伤，28岁。

谢乾隆，男，铁路三局六处工人，成铁“二七”造反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2岁。

邓德成，男，成都二十九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6岁。

王国清，男，市人委财贸修建办公室学工，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1岁。

张绍瑜，男，西南电建三公司工人，内江工人造反司令部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0岁。

许敏，女，工农兵相馆职员，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5岁。

贺莉，女，成都一中学生，红成，成电东方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9岁。

陈永德，男，低压开关厂工人，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23岁。

范培瑾，女，502厂子弟小学毕业生，五湖四海造反团红色堡垒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3岁。

李全华，男，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地东方红公社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2岁。

何正玉，女，成都十五中学学生，红成，川医九·一五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5岁。

戴祖国，男，成都九中学生，红成，川医九·一五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9岁。

刘庆中，男，蔬菜公司职员，兵团财贸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3岁。

口口口，男，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5岁。

程其逸，女，成都二十六中学生，红成，成地解大成员，死亡诊断为腹部枪伤，16岁。

傅长松，男，一三二厂工人，一一·一九派四·一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0岁。

李德光，男，四川师范学院学生，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胸部枪伤，26岁。

张金木，男，龙舟路小学学生，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4岁。

彭霓云，女，川师附中学生，红成，东方红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颈部火器爆破伤，15岁。

邓运昌，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8岁。

康忠志，男，成都水利发电学校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颈部枪伤，19岁。

陈明富，男，红卫兵成都闯将革命造反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5岁。

王长久，男，冶金建筑安装公司第三工程安装公司工人，兵团，街道工业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34岁。

王惠明，男，西南送变电工程公司工人，死亡诊断为全身多数性钝器伤，17岁。

杨正业，男，峨眉中学学生，红成，成大八·三一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汽车碾压伤，15岁。

谢云祥，男，成都自来水公司工人，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钝器伤，40岁。

蹇忠贵，男，小天竺肉类供应店工人，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颈胸部枪伤，23岁。

曾向东，女，成都二十三中学生，红成，工院十·一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右下肢枪伤，16岁。

屈德安，男，成都十七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5岁。

杨自强，男，成都二十三中学生，死亡诊断为颈部枪伤，18岁。

李文君，女，红成小闯将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汽车碾压伤，11岁。

杨文柏，男，九四信箱工人，红卫东九四纵队成员，死亡诊断为全身多处钝器伤及锐器伤，31岁。

程遵华，男，四川大学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盆腔枪伤，22岁。

唐福，男，铁道部建厂工程局第二建筑处工人，红卫东五三纵队成员，死亡诊断为全身多处钝器伤，35岁。

徐建民，男，成都机车车辆厂工人，兵团，外北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全身多处钝器伤，38岁。

注：

一、本表系自五月六日至五月十六日送到川医病理科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遗体五十二具，均系被产业军直接杀害。另有盲哑学校、红成战士潘水金同志（男，十五岁），因产匪在土桥抢粮，前往护粮时不幸从车上撞下，头部破裂光荣牺牲；成都十七中、红成战士朱用金同志（男，十七岁），在川棉事件中被产匪毒打头部受伤后合并败血症光荣牺牲。此两名均未列入表中。

二、本表中名单的排列顺序，并不代表死亡的先后顺序。

三、表中空白处，尚未查明。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协助我们核实。

四、表中杨文柏同志于五月六日晚，自一三二厂经小路回九四信箱途中，被产业军绑架、活埋，壮烈牺牲；唐福、徐建民同志于五月五日被产业军绑架，次日晨在成都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发现遗体。

五、表中“红卫东”指“红卫东成都部队”；“兵团”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成”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八·二六”指“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

六、以前公布的初步调查材料，如与本公告有出入时，以本公告为准。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 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川医附院革命造反总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

【浩劫墓碑】

1967年万县市“六三”惨案死者名单

王锐 提供 渔歌子 摘录

录入者说明：1967年2月下旬开始，四川省万县专区（今属重庆市）按全省统一部署开始了针对造反派组织的“镇反”运动，万县市职工组织“主力军”被打成“反动组织”，学生组织“赤旗战团”被打成“帮凶组织”，大批人员被抓捕入狱。4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后，被捕入狱的“主力军”头头熊道生、“赤旗”头头钟嘉钰等被中央点名送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5月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否定了此前的“镇反运动”，要求给被打击的造反派“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万县地区的平反工作迟迟未能进行。6月3日，“赤旗”的上千学生列队前往公安局，欲揪斗公安局长王杰，遭到事先得到消息后有准备的公安消防队员突袭，导致学生在惊慌外逃时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当场死亡30人，伤近80人（后有送往重庆救治的伤员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当晚20时至4日2时在万县专区医院外科对当场死亡的30具尸体进行了验尸。

此名单根据“万县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四川万县市“六·三”大血案专刊》（1967年6月10日出版）中公布的《验尸纪实》及《烈士简介》等文中的内容摘要录入，略去了验尸情况记录等文字。原记录中大多死者无年龄记载。据该报记载，此次尸检由十五个单位的代表参加，各代表签名是：中国科学院何关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王斌，重大“8·15”赴万调

查队张应田，首都红代会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徐茂云，首都红代会北医 8·18 战斗团袁德群，万县专区防疫站毛泽东思想红卫战斗团余子杰，首都红代会北京外贸学院燎原公社赵晓蓝，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站刘尔淮，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军分区张广、刘元敏，万县专区人民医院“白求恩”战斗团周伦、毕礼华，万县专区公安处、专区政治“星星之火”造反团宁江，中国人民解放军 7799 部队王合中，万县市公安局政法造反军李燕君、李丰寿，万三中红旗公社程文伦，万县卫校赤旗王尚志。

30 名死者身份简介如下（另据谢声显提供的《江城战报》1968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纪念六三惨案一周年”专刊刊登的 31 人照片专版上的简略记载补上了全部死者的年龄）：

1. 万迪胜，男，北山路小学高小二年级小闯将，14 岁。
2. 李泽润，男，万三中赤旗战团，19 岁。
3. 方小元，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9 岁。
4. 黄家富（《江城战报》作“黄家福”），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5 岁。
5. 罗大志，男，万三中赤旗战团，18 岁。
6. 万世才，男，万一中赤旗战团，20 岁。
7. 陈忠厚，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9 岁（《江城战报》上年龄为 18 岁）。
8. 潘中国，男，市商校赤旗战团，22 岁。
9. 张道培，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6 岁。
10. 幸前普，男，市商校赤旗战团，16 岁。
11. 何明中（《江城战报》作何明忠），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9 岁。
12. 张承云，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5 岁。
13. 李国良，男，万一中（校徽 1416）赤旗战团（袖章 00013），18 岁。
14. 周小夫，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4 岁。
15. 杨永东，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9 岁。
16. 刘林逐（《江城战报》上作“刘宁筑”），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8 岁。
17. 赵隆渊，男，万三中（《江城战报》注明为赤旗成员），14 岁。
18. 张明先，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共青团员，20 岁。
19. 周依华，男，万一中赤旗战团，共青团员，18 岁。
20. 张跃富，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八一”，18 岁。
21. 陈克新，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八一”，17 岁。
22. 张勇，男，万三中赤旗战团“七一”，18 岁。
23. 张德礼，万二中赤旗战团“农奴戟”，16 岁。

24. 陈启华（《江城战报》上作“程启华”），男，电校赤旗战团，17岁。
 25. 晏文永，男，二中赤旗战团，19岁。
 26. 李大刚，男，万三中赤旗井冈山，18岁。
 27. 胡泽祥，机械厂半工半读赤旗战团，17岁。
 28. 陈开建，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4岁。
 29. 何伟，男，建华机械厂赤旗战团，18岁。
 30. 何帮发，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7岁。
- 《江城战报》上的介绍多出一人，估计是送到重庆后抢救无效死亡者：
邓世坤，男，万三中赤旗战团，17岁。
-

【浩劫墓碑】

永川两派武斗死亡人员名单

叶大明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叶大明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中的附录。叶大明文革时为四川省国营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曾任永川红旗派一号负责人、永川三代会勤务组组长、四川省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廖益书（当年与红旗派对立的永川工农派学生领袖，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永川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为叶大明回忆录所写的序中说，《永川县志》记载（583页），在文革时期1967至1968年的几期武斗中，永川两派群众非正常死亡345人。这里只是叶大明在写作回忆录时搜集到的不到半数的一部分（其中许多还不知姓名、身份），还望知情者订正、补充。

永川文革武斗中的两派为红旗派和工农派（专联司）。红旗派得到以张国华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的支持，被认定为革命左派，并由成都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后发给红旗派枪支弹药，成立了川东民兵师，将工农派打出了永川；工农派后来得到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因与张国华闹矛盾而跑到重庆另立中心）的支持，在重庆八一五派武装支持下又打回永川。两派武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才结束。

红旗派死者

1967年7月26日永川第一次动枪死亡人员

李瑞新：永化中学学生；

张锦奎：女，汽车二十五队会计；

赵松祥：汽车二十五队驾驶员；

廖兴柱：汽车二十五队修理工；

杨正荣：运输二社工人。

1967 年 8 月 21 日红旗派攻打工农派占据的地区大楼死亡人员

叶代光：永川化工厂一车间副主任。

得知工农派已经败逃，时驻铜梁的五十四军 7801 部队安排军车送此前撤至铜梁的红旗派人员回永川。因路上遭遇武斗冲突耽误了时间，直到天黑才从成渝公路向永川城驶来。守卫在西北公路前线的红旗派人员见有车队开来，以为是工农派杀回马枪打回来了，急用机枪扫射阻拦，误将头车驾驶员两位军人打死。

杨万模：54 军 7801 部队驾驶班长；

李茂林：54 军 7801 部队副驾驶。

1967 年 9 月 9 日按永川支左小组安排支援荣昌造反派武斗死亡人员

陈勇：永川中学学生。

1968 年 2 月 9 日红旗派大逃亡时死亡人员

刘和：新华书店经理，被泸州红联站在兆雅抓到，交给江津军分区，转交给工农派后，在医药公司被打死。

□□□等 2 人：重庆反到底派学生，姓名没有留下来。

□□□等 6 人，重庆反到底派，在武装部抢枪被打死，姓名没有留下来。

1968 年 4 月 22 日参加隆昌保卫战死亡人员

四川省革筹组批准隆昌县于 1968 年 4 月 25 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对立的泸州红联站、重庆八一五等组织认定这是一个单方面的“派革委”，不能让其成立造成既成事实（因当时按中央规定革命委员会一旦成立就“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调集重兵向隆昌大举进攻，致使隆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完后即被迫扛着牌子逃亡自贡成为“流亡政府”。永川红旗派的川东民兵师接受隆昌县武装部指挥参加了隆昌保卫战。

张昌维等 7 人：永川运输社职工，其他人姓名不详。

1968 年 5 月 9 日打安岳龙台死亡人员

舒全勇：地区川剧团，乐师；

吴云生：川东民兵师二营一连排长，四川汽车制造厂工人；
黄□□等 3 人：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通讯员（黄□□系重庆九龙坡区中学生），三人均安葬在自贡市。

1968 年 5 月 16 日打大足贯顶坡死亡人员

周光全：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弹药手；
余从来：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机枪副射手；
万荣福：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机枪手；
贺光涛：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一排战士；
李祥国：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战士。
（五人均安葬在大足县贯顶坡。）

1968 年 6 月 16 日第二次打高平死亡人员

张长行：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副指导员；
唐明中：地区柏林酒厂职工。

1968 年 9 月 9 日返永川后被打死人员

殷熙：大安区粮站副站长。

1969 年 5 月 16 日双石事件死亡人员

周中汉：农技校教师。
杨维邦：农技校学生。

据事后统计，红旗派在四期武斗中，死亡人员共计 70 人。其中农民 35 人，工人、干部 15 人，学生 7 人（重庆学生 4 人，永川 3 人），教师 1 人，解放军战士 2 人，重庆等外地人员 10 人。当时在红旗派一派掌权的情况下，由永川三代会作出决定，对农民、城镇居民及无单位的牺牲者，每人一次性发给人民币 300 元抚恤金（等于当年三级工的一年工资）；有单位的死者，按单位职工工伤死亡条例办理，发放不得低于人民币 300 元的抚恤金；当时有专人审核名单，专人负责发放。实在找不到单位或亲属领取的抚恤金最后如数上缴。全部名单由我签字。但后来因我在被清查中遭到多次抄家，名单已被抄没，其中许多人（特别是农民和外地人员）的情况已无法回忆。

工农派死者

1967 年 7 月 13 日

蔡锡之：在树上观察武斗情况逃跑时从树上跳到房顶后摔在地上死亡。

1967 年 7 月 29 日在军分区武器库抢枪被打死

刘殿模等 14 人。

1967 年 8 月 23 日

蔡昌凡等 34 人，在铜梁西泉武斗时死亡。

1968 年 7 月 31 日在大足武斗中死亡

□□□等 46 人。

工农派武斗死亡人员，是根据当时的告状和上访材料以及有关头头回忆而来，因从未做过统计，许多姓名不详，资料仅供参考。

【书海泛舟】

周伦佐书中写到的西昌文革

（《“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渔歌子 摘录

摘录者说明：已故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文革时期是四川省西昌地区造反派骨干。在他的文革研究专著《“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多处以西昌地区的文革情况为实例来说明一些问题。现将这些片断摘录出来，以供研究地方文革者参考。本篇系从周伦佐生前提供的电子文本中摘录的，未与印刷成书后的内容进行逐字对照。若需引用，请注明摘自该书稿电子版。小标题是摘录者另拟的。

文革初期的政治迫害

我所在地区的西昌县县级机关当时有干部 543 人，划为“三类”的 51 人，占百分之九点三，划为“四类”的 33 人，占百分之六，打击面达百分之十五点三；副县级领导干部 5 人中 2 人划为“四类”；对划为“三、四类”的人进行残

酷的批判斗争。我所在的西昌县星火青年农场有知识青年 163 人，定为“三、四类”20 多人，打成“阴谋集团”10 多人，两个分场的团支部书记都姓蒋，又都是农场最漂亮的姑娘，仅仅因为是“黑五类”子女，便被定为“篡权”，都被批斗致疯。

——第二篇第六章第一节
“‘文革’中的三次政治迫害”

官方领导的“破四旧”

我所在城市 1966 年 6 月 19 日成立了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之后，又于 1966 年 9 月 5 日正式组建了官方“破四旧”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当时县图书馆，由城关镇主任和武装部长负责指挥“破四旧”的全部工作。“破四旧”办公室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分别由公安局、银行、卫生局、商业局、文化局派人组成。

“破四旧”运动涉及范围很广，重点很多，不仅涉及了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发行界、工商界、宗教界，而且还涉及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用品。从“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结束，所有的活动，都由地委宣传部和县委宣传部指挥的官办红卫兵一手实施，并由公安、宣传、文化等部门协助。

1. 把 1950 年“土地改革”到 1963~1965 年“小四清”和“大四清”期间，历次政治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以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四不清”干部、被公检法列为“内专”的人和在新中国任过“军、警、宪、特”的人，全部划入“牛鬼蛇神”范畴作为“破”的重点。先由公安部门提供嫌疑人名单，再由官办红卫兵对这些人搞突然袭击进行抄家。抄出问题的，便挂黑牌、戴高帽、游大街、站高凳、跪硬地，白天黑夜交代，大会小会批斗，甚至进行捆绑吊打或拳脚相加。很多人不仅被触及肉体 and 尊严，而且还被“绳之以法”并株连子女及亲属。一个小小的县城，直接受害者超过千人。

2. 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当作封资修的“黑据点”来破。破法有四：一是停止各教会的一切活动；二是将教会活动的庙宇、寺观、教堂等进行查封或改作他用，例如县境内的清真寺，有的被生产队用作保管室，有的被用作牛马羊厩，被毁坏不堪；三是直截了当拆除庙宇及其设施，例如泸山上的道教庙宇“文昌宫”、“玉皇殿”、“青羊宫”、“五祖庵”，佛教庙宇“光福寺”、“三教庵”、“观音阁”、“瑶池宫”等的佛像、菩萨、经书、挂匾、楹联、碑碣等

宗教文物，连同寺庙一并毁坏；四是没收道教长老、佛教仲尼、伊斯兰教阿訇、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及其他教会人员念经、诵佛、礼拜、祈祷活动时穿戴的服饰和其它用品，如经书中的《佛经》、《古兰经》、《圣经》，用品中的器乐、乐谱等。

3. 把文化事业单位列为“破”的重点。运动一开始就把县电影管理站、县文化馆、县图书馆等单位宣布为宣传贯彻“封资修”文艺黑线的“据点”。首先将县电影管理站放映过的影片全部宣布为“反动影片”，并连同影片剧照一齐封存。其次是命令县文化馆封存“文化大革命”前为农村、厂矿、学校所购置的器乐、道具、服饰、文房四宝等物品以及文艺宣传作品。县图书馆被宣布为封资修的“黑窝”，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之外的图书杂志，全部被封禁。勒令新华书店、桃园书店和各个租书点停业清理“坏”书。

4. 把县城所有街道、商店、单位的传统名称当作“四旧”来破。原来的上西街、下西街、顺城街、南街、北街和西昌酿造厂、北街幼儿园、西昌群众报等名称，本来与“四旧”无关，但为了立“四新”，也分别改为东风路、向阳路、红旗路、东风酿造厂、红旗幼儿园、新西昌报。

5. 把人们的发型和穿着当作“四旧”来破。男性的发型只要不是光头、小平头、太平头、学生头，都被视作“四旧”。女性的发型只要不是女式军人短发、学生短发、农民短发、长辫子、小辫子的，都是“四旧”。男性和女性服装，只要不属于军人式、干部式、工人式、学生式的，都为“四旧”。

官办红卫兵两个多月的“破四旧”，使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成千的家庭被抄，上万的个人被破，原来的社会秩序被全部打乱，所有的人都过上了一律化的生活。

——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

“保守红卫兵：特权阶层子女的恶性表演”

保守派加入造反派

除了北京和那些造反派与保守派一直对峙到革委会成立的省份之外，全国各地的保守红卫兵，后来多数都加入了分裂为两派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例如：重庆官办的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因倾向造反而于1966年9月20日被市委强行取消之后，多数成员纷纷赴京告状并加入到造反队列中去；我所在地区第五批赴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中等学校官办红卫兵，就于1966年10月18日检阅完毕后的当天，在北京的接待站里批斗了官方派去带队的地委宣传部宋某，宣布集体造反——成立了名为“一〇一八”的造反红卫兵组织。

造反派不歧视“走资派”子女

反之，造反派对“走资派”子女却从不歧视，甚至还把他们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视为本派“阶级成份”纯正的资本。我所在地区卫校学生L，其父为某地级市副市长，运动初期被作为“走资派”打倒，本人在校期间不仅一直担任造反红卫兵组织“炮打司令部”战斗团团长，而且还被推选为地区造反红卫兵司令部二把手，直到毕业离校。前面提到的那位现任某中央级刊物副主编的著名诗人也属此类实例：其父母均为从延安鲁艺出来的“三八式”老干部，因与文艺沾边，运动之初被作为“黑线人物”打倒。他不仅首批参加了造反红卫兵，而且长期担任地区最大中学生造反红卫兵组织“一一八”战团的宣传部长。我所在地区当时被打倒的几位地委主要“走资派”的子女，1967年“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都参加了所在学校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他们不仅从未受到歧视和打击，反而对于这些造反红卫兵组织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某种微妙的缓冲作用。这要算造反派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员成份缺乏自信的另一种表现。

造反派数例

……我所在地区：西昌县政府干部冼某，“红五类”出身，但岳父岳母都是“专政对象”，人生的理想不是入党当官而是成为一名诗人，已发表不少作品，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并定为“四类”，遭受上百次批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率先造反，后任县造反激进派总部一号负责人。地区农业局干部郝某，“黑五类”子女，运动初期因“言论问题”联系到家庭出身而挨批斗，1966年11月最早起来造反，后任地区农业系统造反组织司令和地区造反稳健派总部三号头头。地区电影公司放映员曾某，“麻五类”家庭，上高中时因“反动标语”问题被开除学籍，运动初期以“言论问题”批斗，1966年11月带头造反，并任地区文化系统造反稳健派组织司令。西昌星火青年农场小H，“黑五类”子女，酷爱书法艺术，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运动初期被定为“阴谋集团”成员，1966年12月与其兄一起领先造反。西昌县河西公社知青才某，“黑五类”家庭，上高中时因组织“友谊社”被定为“思想反动”，1966年12月最先造反，并成

为当地知青造反组织头领。盐源县国营农场知青雷某，“红五类”出身，读初中被定为“思想落后”，高中时被定为“思想反动”，1966年12月为首造反，1968年任农场革委会副主任。

我亲历过这样一件事：1969年3月，我所在地区造反派两大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在造反激进派的战前布置会上，总头目特别强调：别让出身不好的人上前线，以免被对立派抓住把柄说不清楚。这种变相的保护不是个别现象。

1968年8月，我所在地区造反激进派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对立派，不惜抓住对方已经辞职的原总部一把手X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在军分区的支持下，他们到劳改监狱提讯X过去的同学，千方百计诱使其提供X曾经参加袍哥和参与土匪叛乱的证据。随后在整理上报四川省革委的材料时，又将证词中所有“大概”、“可能”、“好像”之类的关键性字眼一概删掉，终于骗得看了这份材料的成都军区司令员兼省革委副主任梁兴初在接见两派时轻率表态说“X是个历史反革命”。尽管如此，X所属的造反稳健派出于派别利益考虑仍然对其实行保护，使得支持造反激进派的军分区也无可奈何。同样，稳健派也在大整对立派有家庭问题和历史问题人员的“黑名单”，或张贴或广播或上报；但激进派对所涉及的成员也是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保护，从不落井下石。

——第一篇第四章第一节
“造反派的构成”

1969年4月，我所在地区造反激进派在一次大规模武斗中抓了对立派一批头目，临时关押在地区邮电局。总部指派负责宣传的黑色子女王某前去审讯，以便获取反戈揭发材料。王某见武装看守人员对俘虏大施肉刑，于心不忍，立即严厉禁止，并安排他们洗漱、吃喝，随后又清还随身物品；在写了反戈声明后，将他们一律释放回家。此事被迅速告到曾为某地质队保守组织头目外号“李老保”的总部武斗司令那里。司令大怒，向王某要人。王某自恃造反资格和社会名气，据理反驳，最后不了了之。

——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造反派的全盛时期

1967～1968年，在保守派彻底瓦解的省份，造反派的队伍扩展到什么程度？几乎包容了每个城市、每个乡镇的绝大多数人口。我所在地区当时有二百多万人

口，大约百分之八十参加了造反派两大派。支持两派的军队和带有两派倾向的当权派不算，再除去无权参加组织的“黑五类”、在押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和不愿参加组织的“逍遥派”，从城市到农村，几乎很少有人没有参加两派造反组织和不带派性倾向。

我至今忘不了所在地区造反派发生分裂前的壮观场景，时间是1967年5~10月。地区首府——西昌的造反派，成立了“地区联合总部”，按地质系统、邮电系统、运输系统、工业系统、冶金系统、地委系统、专署系统、财贸系统、农业系统、文化系统、学生系统、知青系统，建立了八个司令部和四个兵团。所辖十个县也分别成立了统属于“地区联合总部”的“县联合总部”。造反派编制之规范、秩序之井然、行动之整齐、势力之强盛，令人震慑。从基层单位到地县一级，军队和干部都争着表态支持联合起来的造反派，各级“支左”部队和临时负责维持正常生产的领导干部要作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经过造反组织同意才能畅行无阻。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万象更新的面貌，连小偷都几乎绝迹。“文革”十年，小偷绝迹这类现象只在三个时候出现过：1966年冬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1967年夏季否定“二月镇反”时，1976年春季“四五运动”时。与其说是革命的铁拳吓破了小偷的贼胆，不如说是革命的气氛感动了小偷的良知。

——第一篇第四章第三节
“造反派的成份演变”

造反派的分裂

造反派分裂为两派，自然不是在“解放革命领导干部”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造成的。

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提出“保”哪一位领导干部并尖锐对立，是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必然发生的事。例如四川的“红成”和“八二六”在“刘、张”问题上的打与保。在造反派如日中天的时候，保哪一位当权派，更多是两派出于派别利益需要采取的一种手段，领导干部不仅不可能成为两派分裂的导火索，反而往往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我所在地区的原地委第一书记杨新，曾是华国锋任游击大队政委时的搭档，1964年从中央某部临时下放到地方支援工作。他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工作扎实，深受干部群众好评，因“文革”爆发而滞留地方。1967年底，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准备“解放”他，不料稳健派抢先一步贴出了“解放”他的声明。从此，他变成了激进派攻击稳健派的政治口实，也变成了激进派批斗“走资派”的头号对象，不仅未能进入地区革委会，反而受尽了迫害和凌辱，最

后病死北京。政治不择手段，造反派也学会了此道。

……1967年9月，首都“三司”所属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钢铁学院“红旗”和四川大学“八二六”的红卫兵来西昌串联。他们凭着显微镜一样的观察力，很快发现“地区总部”领导班子不是工人阶级掌权、思想和行动都过于右倾等问题。在他们的积极煽动下，地质系统、邮电系统、专署系统、知青系统的全部和学生系统、文化系统、财贸系统的一部分，终于从“地区总部”中分裂出来自成一派。西昌地区造反派从此陷入两大派严重对立甚至杀声震天的自残局面。两派武斗持续到1969年6月，两派对立甚至延续至1976年。这期间，为了寻求军队和干部的支持，造反派不得出让出分裂前曾经掌握的主动权；而水火不容的对立和枪炮相见的武斗，更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和人民生活的巨大灾难，逐渐将造反派推到了民众利益的对立面。

从激进思想看，首都“三司”提出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类口号，除了观点偏激，毫无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言。从激进行为看，成都“八二六”1966年11月13日在人民南路广场批斗李井泉大会上的造反，1966年12月大动干戈对《四川日报》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查封，1967年1月与重庆、内江造反派对四川省轻工厅转存于球溪河糖厂四十三箱文书档案的抢夺，无一不是以极端化方式演出的无意义闹剧。

——第一篇第四章第三节
“造反派的成份演变”

我所在地区造反派分裂的直接导因浅显而深刻：1967年10月之前，造反总部的一、二把手都是地委机关最早起来造反的两位中层领导干部。在首都“三司”和成都“八二六”串联红卫兵的鼓动下，一些工交企业的造反组织提出一、二把手必须由工人担任，其他行业更多的造反组织却坚持认为地委中层领导干部也可以担任此职。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在1967年10月25日正式分裂为两大派。后来还爆发了历时一年多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武斗。

——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军队与武斗的关系

造反派分裂后所进行的武斗，无疑是造反派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篇章。我所在地区造反派两大派的武斗，从1967年12月30日开始到1969年6月正式结

束，历时一年零六个月。武斗中，各支一派的军队，不仅将枪支弹药明抢暗送给两派群众组织，甚至亲自出面参与策划和指挥武斗。武斗最疯狂时，两派拥有的常备持枪参战人员竟达 2000 多人。据武斗结束后的不完全统计，两派死于非命者达 1200 多人，伤残者超过此数，误死误伤无辜者 100 多人。至于生产设备、生活设施的毁坏和停工、停产造成的经济损失，那就只能用难以数计来形容了。

我所在地区的军分区之所以支持从老造反派中分裂出来的造反激进派，是因为“二月镇反”时整了老造反派与之交恶在先，铁道兵之所以支持老造反派，是因为军分区已经支持了造反激进派。不同的选择，除了情感上的亲疏，自然不排除军队之间在对象认知及权力关系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造反派分裂为两派的原因，但对两派由文斗升级为武斗，的确起到了无法否认的推动作用。

——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革委会实际由军人掌权

……我所在地区：地革委由 25 人组成。两派造反派共占 16 个代表席位，每派 8 人（其中副主任 2 人、常委 2 人、委员 4 人）。两派共推荐干部代表 6 人，每派推荐 3 人（其中副主任 2 人、常委 1 人）。军队代表 3 人：军分区 1 人担任主任，铁道兵八八一五部队 1 人担任第一副主任，铁道兵八七八五部队 1 人担任第二副主任。如果只看名额，军队代表不仅在委员中占绝对少数，就是在常委和副主任中也只能分别占到接近六分之一和略高于四分之一。然而在党的核心小组——这个由 5 人组成的决策圈里，军队代表就占 3 人——还是组长和副组长，干部代表占 2 人——仅为一般组员，没有一个造反派代表。

——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
“军人掌权时期”

文革中最后一任地委书记的命运

我所在地区 1976 年 10 月之前的最后一任地革委主任和地委书记辛易之，就是这样一个无辜受害者。他曾任重庆市“文革”前的市委书记处书记，一介知识分子，“文革”中被打倒，在 1967 年 4 月中央解决四川省问题的专门会议上，遭到过江青点名指责（编者注：此说有误，应是 1968 年 4 月 27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的讲话）。1972 年调西昌地区担任党政一把手。上任

之后，他顶住尚未回营的军人政要们的巨大压力，积极为此前被军人政权错捕、错判、错戴帽的造反派和其他干部、知识分子及普通群众落实政策，并解决各种涉及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具体问题。几年中，由他亲自督促而落实政策的受害者不下百人，其中甚至包括：运动初期被官方打成“黑线人物”的原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 Z，因为“历史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财贸校教师 X、县林场老工人 W，被军人政权错误枪决的乡村教师 J。他生活简朴，作风深入细致，看人从不死盯“家庭出身”，对造反派中有书卷气的青年特别关照。1976 年遭到造反派冲击时，仍不计个人恩怨，尽力为各种受害者解决多年遗留的问题。这么一位“文革”中罕见的正派干部，却在 1976 年 10 月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被他的副手——地委副书记 L 以“支持造反派篡党夺权”的罪名向上报告，受到省委“公开点名批判”并撤职的处理，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第二篇第五章第三节
“干部掌权时期”

历史记忆的恢复

1999 年和 2000 年，四川省西昌市政协先后编辑出版了《西昌文史》第十五辑和第十六辑，主题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西昌”。二十多位撰写者中，有当年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有当年戴着“右派”帽子的教师，有当年的造反红卫兵和保守红卫兵，有当年的转业军人和逍遥派，也有今天的地方文化工作者。这些回忆文章虽然免不了体制话语习惯，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比较理智，能够客观地看待当时的人和事。当年的领导干部在诉说自己挨批斗经过的文章中，有的坦率承认：运动初期把不少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三、四类”，伤害了许多群众；有的客观叙述：运动初期的保守红卫兵和他们的“破四旧”行动，是由官方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的；有的清楚记得：保守派兴起后主要是斗“黑五类”为标志的“阶级敌人”，造反派兴起后主要是斗“走资派”而放松了斗“黑五类”，造反派分裂并发生武斗后主要是他们两派互相斗，而放松了斗“走资派”和“黑五类”。对于西昌的武斗，事件的目击证人——当年的激进造反者和稳健造反者，在回忆文字中都一致给予了谴责并深表忏悔。甚至前面提到的那位某学院中文系的华教授，在专写自己“文革”初期被赶下农村之事的文章中，也再没有一个字提到所谓“受造反派迫害”。

读了这两本小册子，我有一种欣慰之感。因为其中不仅隐含了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而且还显现了普通人士社会良知的逐渐苏醒和历史记忆的缓慢恢复。

——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

【小资料】

四川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成立简况

渔歌子 整理

整理者说明：文革时期，四川省下辖成都、重庆、自贡、渡口（攀枝花）4个市，温江、绵阳、内江、宜宾、乐山、江津、涪陵、万县、南充、达县、雅安、西昌12个专区，阿坝、甘孜、凉山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专区均改称地区。以下按各地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时间先后排列（各地举行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庆祝大会时间都在批准时间之后）。

除王茂聚、天宝在军分区的职务是非现役军人的军内兼职外，四川十九个地市级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由现役军人担任的有十七个，所占比例为85%。

本篇在整理中得到余汝信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自贡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12月26日批准成立，主任李宗白（自贡市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

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7日批准成立，主任林长修（五十军一四九师师长）。

渡口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23日批准成立，主任徐驰（原冶金部副部长兼中共攀枝花（渡口）特区党委书记、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4月18日批准成立，主任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

成都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4日批准成立，主任孙洪道（五十军副军长，成都警备区司令员）。

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8日批准成立，主任黄鹤寿（工程兵五十四师副政委，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16日批准成立，主任高恩堂（万县军分区第二政委）。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29日批准成立，主任蓝亦农（五十四军政委）。

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7月1日批准成立，主任陈崇礼（内江军分区司令员）。

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7月2日批准成立，主任张金省（五十军一五〇师政委）。

达县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2日批准成立，主任王俊洪（达县军分区代政委）。

甘孜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2日批准成立，主任天宝（原副省长兼甘孜州州长，康定军分区第一政委）。

阿坝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批准成立，主任周子珍（茂县军分区司令员）。

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4日批准成立，主任徐广生（茂县军分区副政委）。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26日批准成立，主任张示心（五十四军一三〇师政委）。

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1月16日批准成立，主任杜林（西昌军分区政委）。

凉山彝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9年1月2日批准成立，主任王民英（凉山军分区政委）。

南充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9年1月6日批准成立，主任李普爱（五十四军一三四师政委）。

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9年9月29日批准成立，主任耿忠贤（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后十三军副军长）。

【小资料】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王锐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成都红三司九中八二六、九毛（注：“九毛”系九中毛泽东主义兵团简称）《反修》主办《反修之声副刊》第二、三期合刊，1968年6月15日出版。这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时的委员名单，以后多有变动。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名单另见《记忆》2009年第二期（总第十二期）。

孟广涵，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47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莱芜人

张兆泉，西南局财贸政治部主任，52岁，雇农出身，雇工成份，党员，安徽六安人

李克，省电管局代局长，53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衡水人

姚振声，前省邮电局局长，49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莱城人

吴挺进，省邮电局副局长，4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灵石人

刘志华，省物资厅副厅长，46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西黎人

薛华文，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副局长，5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南新县人

岳纪纲，省交通厅副厅长，45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钜鹿人

方清生，省粮食厅副厅长，56岁，贫农出身，雇农成份，党员，湖南平江人

陈少山，省农业厅副厅长，53岁，中农出身，自由职业成份，党员，山西定襄人

周云峰，省计委处长，50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东海阳人

吉杰，西南局农办秘书处长，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临猗人

岳林，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52岁，贫农出身，学徒成份，党员，江西吉安人

夏丹亭，成都农水局长，市革委副主任，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掖县人

冯金璋，自贡市委副书记，现自贡市革委副主任，49岁，经营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肥乡人，

苏新，省委候补委员，阿坝州副州长，49岁，羌族，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茂汶人

阿登，阿坝州州长，35岁，藏族，贫牧，牧民，党员，四川红原人

郭林川，前宜宾地委组织部长，现宜宾地革委副主任，47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肥乡人

刘海清，开县县委书记，现万县地革委副主任，44岁，中农出身，渔民成份，党员，山东无棣人

张九山，江津地委副书记，49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东莱芜人

苏毅，涪陵监察组副组长，现万县地革委副主任，女，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沂县人

桂竹清，乐山专区公安处副处长，女，38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沁县人

霍九锡，甘孜州委副书记，43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临县人

罗开文，凉山州副州长，38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冕宁人

欧本文，783厂党委书记，现783厂革委会主任，51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江西会昌人

谢殿举，雅安汽运公司党委负责人，48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桂平人

刘青发，西昌地委农工部副部长，47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洪洞人

郭一民，原宜宾专区农业银行行长，42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永城人

秦中朝，省林业厅副厅长，61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平昌人

金苗，安岳县供销社副主任，女，47岁，贫民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安岳人

杨子成，65厂工人，26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彭县人

丁亚芳，719厂技术员，女，27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上海人

谢国辉，毛巾床单厂工人，40岁，下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安岳人

杨柱盛，420厂保管员，35岁，中农出身，转业军人，党员，四川西充人

陈孝仙，65厂工人，26岁，贫民出身，工人成份，党员，福建人

谢其才，65 厂工人，29 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人

张利，省邮车总站司机，32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大同人

曹守训，建一局三公司计安员，37 岁，中农出身，工人成份，浙江海宁人

宋德成，成都饮食公司厨师，28 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成都人

况大志，涪陵动力厂工人，26 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团员，四川涪陵人

唐天秀，灌县森工机械厂工人，女，25 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射洪人

罗文俊，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32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成都人

唐大炎，铜梁县庆龙公社社员，23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团员，四川铜梁人

程思杰，双流县白家公社大队团支书，24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双流人

牟其清，忠县平山公社大队党支书，51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忠县人

向文鼎，巫山县白水公社民兵连长，32 岁，下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四川巫山人

熊天高，南川县南扬公社大队民兵排长，26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南川人

傅国清，武隆县七场公社民兵连长，23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武隆人

荣家琪，川西森工局工人，36 岁，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乐至人

李荣，四川省水文总站助理技术员，29 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长寿人

苟天宜，旺苍邮电局邮递员，26 岁，雇工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资阳人

陈永发，自贡市广播电台修理工，27 岁，手工业者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江苏人

骆华凯，凉山州人委总务科小车司机，33 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三台人

张文准，四川汽车二十队驾驶员，30 岁，下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会理人

何考文，平昌县尖山公社社员，21 岁，下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平昌人

谢文清，自贡市自流井凤凰公社社员，27 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自贡人

海采木又哈，凉山美姑牛牛坝乡社员，女，22 岁，彝族，半奴隶出身，半奴隶

成份，四川美姑人

罗昭容，重庆南桐公社社员，2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人

吴国民，重庆江北区公社社员，3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四川人

石昌民，重庆南坪公社社员，3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重庆人

民苏，平武县白马公社社员，女，27岁，藏族，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

四川平武人

邓芳芝，中江县继光公社社员，女，75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

中江人

陈荣，成都工学院学生，2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三台人

钟加钰，万县二中学生，19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万县人

崔庆山，重庆綦江齿轮厂工人工程师，52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

川人

张丽珍，重庆纺织五厂工人，女，38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团员，四川人

王文芹，重庆新华印刷厂工人，女，26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北京

人

蔺习廉，重庆长江机床厂工人，26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团员，重庆人

杨大渝，重庆人交修理厂工人，25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四川南充人

胡云，成都刀具厂工人，33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江苏武进人

韩定志，重庆纺织一厂工人，女，45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巴

县人

田常信，绵阳肉联厂工人，25岁，小商出身，工人成份，团员，四川江油人

瞿福祥，泸州255厂工人，26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陕西洋县人

李先德，宜宾电厂工人，26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刘志兴，乐山沫江煤矿工人，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临县人

杜仲民，内江锻压厂工人，30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南部人

段守章，资中硫酸厂化验员，26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湖北武汉人

周康林，乐山肥皂厂工人，23岁，小贩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乐山人

陆伦智，成都龙泉公社社员，39岁，下中农出身，下中农成份，四川成都人

王正忠，成都金牛区社员，29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成都人

陈素英，温江涌泉区涌泉大队社员，女，23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

四川温江人

罗昌秀，宜宾凤仪公社民兵连长，女，4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四川宜宾

人

李祥禄，泸县奇丰公社大队贫协主任，女，44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

四川泸县人

王正海，乐山一区通江公社民兵连长，23岁，小贩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乐山人

邓元江，开江县先锋公社一大队社员，27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开江人

刘陵川，重庆市运输公司汽车保修工，28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湖南常德人

王天源，石油化工厂工人，31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绵竹人

廖素芬，自贡市公汽公司革委会主任，女，31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四川自贡人

杨杜珍，达县专区农机厂工人，女，23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辽宁黑山人

黄廉，重庆市木材公司办事员，33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四川铜梁人

邓万禄，重庆二钢工人，28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李贵全，重庆天府煤矿工人，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肖向东，永川中学学生，22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永川人

王道昆，成电学生，22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云南昆明人

黄东升，成地学生，25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垫江人

羊绍兴，三台中学学生，20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三台人

周叙生，宜宾四中学生，20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宜宾人

潘民举，自贡市九一五战校学生，20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自贡人

胡学爱，四川农学院研究生，26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江苏阳州人

王三四，达县中学学生，21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渠县人

曹兆琪，成都十二中学生，女，21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江津人

但开莲，成都无机校学生，女，19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泸州人

张闯，西师学生，24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钱世忠，重庆河运学校学生，22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王朝富，重庆29中学生，22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安徽人

熊加南，重庆六中学生，20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璧山人

王西尧，西师学生，24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彭期远，重庆机制学校学生，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重庆人

廖益书，永川中学学生，女，20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永川人

赵宴之，盐亭县委宣传部干事，县革委副主任，32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盐亭人

蒲月连，中科院西南分院生物系见习研究员，28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成都人

姚梦如，成都卫生学校教师，女，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成都人

马泽林，涪陵公安处化验员，33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丰都人

鲁长发，阿坝州计委科员，35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湖北宜昌人

蒋一德，内江农校团委委员，26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内江人

格桑曲批，甘孜报社藏文版编辑组长，26岁，藏族，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巴塘人

吴欢迎，省歌舞团演员，23岁，革干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山东黄县人

康志忠，建工部一局一般干部，37岁，雇工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秀山人

吴学恩，西南科分院研究所技术员，39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人

洪韵珊，西南局办公厅干事，女，37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内江人

唐月华，成都中心小学教师，女，23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岳池人

沈旭蓉，重庆市人民银行营业员，女，24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浙江人

段炳森，重庆市体委运动员，25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印仁祥，重庆市物资回收公司人事处办事员，28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吕炎，重庆661指挥部，33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湖北汉口人

彭道英，重庆朝天门民小教师，女，26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忠县人

张继堂，重庆市中区人委科员，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江津人

张容英，万县公安局帮助工作，女，2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万县人

甘炳慧，重庆市北碚区支阳公社社员，女，24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预备党员，重庆人

朱玉庭，成都军区副参谋长，64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湖北巴东人

韦统泰，54军军长，50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复程人

刘瑞玲，54 军 134 师 400 团政委，39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迁安人

陈代富，54 军 130 师 390 团政指，26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安岳人

曲竞济，50 军政委，49 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巩县人

杨增彤，50 军副军长，47 岁，小商出身，小商成份，党员，江苏盐城人

陈震宇，50 军 49 师 446 团班长，27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南人

唐兴盛，重庆军分区司令员，52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阆中人

霍烈坤，成都军分区司令员，54 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建平人

李宗白，自贡武装部第一政委，47 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赞皇人

蒋赞鹏，铁道兵五师政治部副主任，42 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定县人

郭全政，康定军分区副司令员，43 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孟县人

廉笠功，西昌军分区副司令员，43 岁，雇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山西平遥人

赵景文，凉山军分区副司令员，44 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滦县人

董崇仁，雅安军分区司令员，45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冀城人

徐广生，茂县军分区副政委，40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长垣人

何伏，温江军分区副司令员，54 岁，中农出身，店员成份，党员，浙江安吉人

韩赓，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45 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新安人

叶书尧，乐山军分区司令员，45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安徽桐城人

成锋，宜宾军分区政委，44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江苏盐城人

陈崇礼，内江军分区司令员，53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安徽金寨人

姜世安，江津军分区司令员，52 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湖北礼山人

黄鹤寿，工程兵 54 师副政委，43 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

高恩堂，万县军分区政委，50 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稷山人

何志远，达县军分区司令员，47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旺苍人

刘福聚，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39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东荣城人

梁善计，军区司令部军务部参谋，36 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陕西长安人

贾本维，军区空指副主任，53 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渠县人